



2017 年西藏 人权状况年度报告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2017 年西藏人权 状况年度报告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

目录

执行摘要	1
建议	3
见解和言论自由权	5
以村为单位的驻村干部制度	5
自动化监控方法	8
数字通信和网络空间的控制	10
网络法律和法规	12
聊天群组	16
和平抗议	17
自焚抗议	18
自焚抗议者出狱	20
结论	21
任意拘留和酷刑	22
酷刑	24
强迫失踪	32
被捕和监禁后	33
结论	39
宗教自由	41
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引来更严格的控制	41
佛教中国化	44
西藏佛教的管理与安全威胁化	44
反达赖集团和宗教节日	45
摧毁佛学院	46
结论	48

发展	50
重新强调“生态文明”	52
三江源国家公园	53
第三极国家公园	54
阿卿贡嘉（可可西里）世界文化遗产	55
发展和保护	56
采矿和草地退化	57
锂对西藏高原的冲击	59
扶贫	61

执行摘要

201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了整个西藏的群众监视计划。数千名派到农牧区的党政干部和官员继续在扶贫工作的幌子下开展群众性的监督和政治教育活动。中国当局实施了新的压制性法律和法规，这些法律和法规支持语音识别系统和面部识别摄像头等先进技术，以提前压制和平的政治异议和政府批评。《网络安全法》生效后，要求网络运营商遵守政府当局提供的数据和其他信息的完整访问请求。引入其他法规来控制不同互联网通信平台上的用户活动。在压迫监视的整个过程中西藏人继续抗议和自焚，以提请注意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的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记录了 12 起已知的抗议活动，包括今年的 8 起自焚事件。

生活在监禁状态下的西藏人在遭受额外的剥夺自由和其他侵犯人权的情况下继续遭到任意拘留、审判前拘留期间酷刑仍然普遍，被拘留者经常被迫陷入逼供。今年发现的几起酷刑案件为不人道的中国司法制度提供了压倒性的证据。强迫失踪的普遍使用保证了执法机构有充分的自由权让被拘留者遭受酷刑，并剥夺他们获得法律代理和公正审判的权利。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报告年度记录了 18 名藏人的拘捕和判刑。被拘留的西藏人现在的总数是 1650 其中 457 人被判刑。146 人的信息无法获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政治犯数据库记录有 5077 名政治犯。

随着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对宗教和信仰自由权进一步加以限制。这些修订的重点与在线大规模监督计划相一致，其中规定强调对与宗教有关的在线交流和网络活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附加修改纳入了 2007 年转世条例，赋予了党和国家对西藏佛教转世系统的完全控制权。今年，中国当局也完成了对色达佛学院的强拆和清理工程，随后由该党组织机关直接统治整个佛学院。加强对宗教机构的控制表明，过去五年实施的大量寺院管理措施将成为永久性特征。这将进一步推动西藏宗教和文化问题的安全威胁化，从而导致宗教自由受到严重侵犯。

无论中国政府持续赞扬西藏 GDP 增长率为两位数的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持续关注采掘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建设水坝、铁路、公路、管道和电力塔，城市化和大众旅游已经对西藏人产生了深层次的剥夺影响。导致了西藏经济的人为增长，这得益于大量的国家补贴和中国移民在两位数增长最明显的城市中心占据主导地位。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为形式的大片西藏土地作为保护区，导致西藏牧民从最有生产力的牧场上强迫搬迁，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来源。

搬迁也是中国政府实施所谓减贫计划的主要手段，这是西藏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证据表明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项目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粮食不安全和水资源短缺，但农村数百万贫困人口仍然面临搬迁或重新安置的危险。西藏人越来越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失去生计来源，依赖政府施舍，以便中国可以通过创建大片的保护区来维护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显然是以野生动物保护，碳捕获为名在气候变化全施加全球领导力。在设计和执行反贫困计划期间，西藏人没有参与，他们的生计利益也没有得到保护或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收到的新信息再次证实，中国当局使用“武力，恐吓和镇压”来实施将藏人牧民以扶贫项目的名义迁往其祖先的土地。

建议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敦促国际社会与中国主管部门接洽并倡导中国：

- 停止实施大规模监视和其他控制措施，控制侵犯人权行为。
- 审查、修改和废除国家安全预防犯罪的合理要求违反隐私权和其他相关人权的立法和政策。
- 在促进和保护隐私权方面实施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标准和保障措施。
- 在促进和保护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方面采用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标准和保障措施。
- 修订《刑事诉讼法》中，以消除侵犯公正审判权利和适当抗辩的权利，影响律师的权利，解除限制和延误律师在拘留后立即与其当事人会面，并与当事人私下会面，不论涉及何种费用；在所有情况下向家属和法律顾问提供拘留和逮捕通知。
- 通过适当的独立调查和制裁引入并加强立法，禁止酷刑并将其定为刑事犯罪。
- 停止对所有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的做法。
- 废除所有能够进行额外司法拘留的立法和做法，包括“在指定地点进行住宅监视”和使用“黑监狱”。
- 公布关押所有人的资料，并释放被强迫失踪的人。释放所有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的良心犯。
- 审查并废除妨碍西藏人民行使和平集会权利的国家立法。
- 坚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8 条和《中国宪法》第 36 条保护和促进宗教自由。
- 移除寺院管理委员会，并允许寺院成员独立统治和领导自己的佛学院等机构。
- 重新评估《宗教事务条例》中的修改内容，并取消所有限制宗教自由的规定。

- 终止对寺院的破坏，并为从色达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驱逐的僧人和尼师提供足够的住房，使他们能够返回他们的寺院和尼姑庵。
- 允许所有人在中国化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不受政府干预地自由实践其宗教信仰。
- 停止针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诽谤活动，并迫害拥有西藏精神领袖相片或任何材料的人。
-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 在制定土地使用政策时，遵守关于食物权和土著人民权利的国际和国家立法公约和承诺。
- 停止迫使西藏牧民从其传统土地上迁移，并停止其他农村居民的迁移计划。
- 让那些经过非自愿移民的人重返传统生活和生计。
- 与包括牧民族和农民在内的西藏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制定替代方式来管理西藏草原，并审查现有的无效、负面和不恰当的草原政策。
- 停止建造新的水坝并评估当地，国家和社会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 停止引水项目和装瓶水，制定更多可持续的替代政策。
- 制定政策和流程，让当地社区参与并利用当地专业知识。
- 建立神圣的自然景观，让西藏人在管理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方面拥有同等的利益相关者。
- 停止退牧还草政策，因为研究表明适度放牧和畜群流动性有利于草原生物多样性，相反，放牧禁令和畜群流动限制不利于草原生物多样性。
- 将西藏牧民纳入涉及草地使用的所有决策过程。

见解和言论自由权

在促进西藏发展与稳定的幌子下，中国当局一直在实施各种倡议，标榜西藏人民的共同发展与安全，实际上，这些都是监视和控制西藏大众的大规模的监视方法。如 2012 年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系统地将乡、镇连接起来让中国政府进行更好的监控（“经济学人”，2013 年）。这些举措属于人权观察界定的社会管理战略，即“通过改善政府提供社会服务来防止社会不满和动荡的政策、方法，体制和态度体系，同时提高政府压制不同意见者的能力”（HRW，2017e）。然后，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服务来伪装和证明这些方案，实际上这些有助于政府压制和吸收西藏人的最终目标。

中国政府将藏人身份、文化和宗教为中心地位的习惯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群众监视否定了西藏人有权行使人权，特别是见解和言论自由。监控政策也侵犯了隐私权，因为人为和科技的监控手段都强行闯入西藏人的生活，通过大规模和广泛的监控范围，西藏人生活在持续的监控之下，恐惧受到国家威权的审查和迫害。藏人被迫约束和审查他们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同时对中国政府表示被动方式来减少骚扰或拘留的可能性，这可能涉及残酷的殴打、酷刑和监禁。中国共产党通过大规模的监控计划，对西藏人实行严厉的管控，很少或根本没有合法的批评和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

以村为单位的驻村干部制度

中国政府认为非常成功的一种监控方法就是以村为单位的驻村干部制度。该方案是为了应对 2008 年西藏抗议运动而于 2011 年开始，并继续扩大和发展。也被称为“惠民生”运动，西藏自治区每年有 2 万多名政府和党的干部在超过 5000 个村庄和 1700 个官方认可的寺院等宗教机构中驻扎，一般情况下一个村子或寺院等宗教机构驻有四个或更多干部。（HRW，2016）中国政府把这一方案称为一项扶贫计划，帮助大批西藏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偏远的游牧民和农业社区的藏人“摆脱贫穷的帽子”。然而，在中国政府网站上发表的一份声明揭示了该方案的

政治目的，也提到了 2008 年的抗议运动：“党在牧区多年来力量薄弱，缺乏方法和人才造成了问题。为此，西藏加快了党的转型——用新的成果促进稳定，发展强大的力量”（中国西藏在线 2015a）。暗示西藏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负责的“问题”并不是指农村村民典型的“贫困问题”。政治意图也可以从昌都地区丁青县桑多乡的村干部工作组组长对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说词中非常清楚，他的责任是：“向所有村民解释政策把爱国歌曲教给孩子们，让年长的西藏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分享新旧西藏之间的差异，让群众在心里感受深深的感谢，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西藏日报，2017a）。

每年都有更多的干部派往村子和寺院，以覆盖西藏自治区更多的农牧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驻村干部在西藏自治区涵盖了 1700 多个宗教场所和 4.6 万个僧尼。虽然由于通讯方式的限制，目前很难获得确切的数字，但由于官方统计不包括未登记的宗教机构中的人口，而且监控方案还在继续增强，因此事实上驻村干部的数量有可能比这个数字更高。在寺院监控制度上，努力确保“反达赖斗争中的寺院管理”，今年中国政府的一份报告表示，2012 年开始的西藏自治区新的寺院管理有助于近年来在寺院保持稳定。（中国西藏广播电台网站，2017）。图 1 显示了监视西藏群众计划的流程图。

驻村干部监控工作的特点是派驻“便民警务站”，这些“便民警务站”通常位于街道上全天候运行。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 696 个“便民警务站”，为居民提供一系列“便民服务”，如提供电话充电、Wi-Fi、雨伞、轮椅，甚至还有热茶和免费报纸（Leibold&Zenz，2016）。不过，其目的是作为社区警务站和 24 小时巡逻的有效前锋作战基地。2017 年，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表示，“便民警务站”在各地城镇的维稳工作也取得了成功（中国西藏网站，2017）。

驻村干部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是使用“双联户管理制度”，将 10 户作为一个联户单位，每个联户单位推选一名户长，严格监控所属 10 户藏人日常的所有活动。称将家庭收入加倍形成更强的安全感，同时作为国家监控系统。中国民族政策和监视计划专家詹姆斯·莱博德（James Leibold）指出：“忠诚的”家庭往往与一个“可疑的”家庭搭配，作为一种保持可疑家庭持续监控的方法（J. Leibol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17 年 10 月 27 日）。基于社区一直在监控潜在的安全威胁的宗教极端主义和监控名单上的“特定人员”。该制度已经形成至少 81140 个双联户，或超过三百万居民（大约为西藏自治区的全部人口）（Gan, 2016）。

在驻村干部制度下，2017 年 3 月 31 日开始了一场名为“四讲四爱”的宣传攻势，眼前的目标是为党的十九大提供良好的环境和长远的目标，同毛泽东许多思想的宣传运动一样，以加强政治“忠诚”为长期目标。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向各级党政部门发出通知，要在各乡、镇开展宣传活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场运

动针对的是“以农牧民群众（城镇居民、流动人员）、青少年学生（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寺庙僧尼为主。”（西藏日报，2017c）。由于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宣传材料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非常明显是针对西藏的新一代藏人。

人权观察报告说，这场运动要求人们“讲党恩爱核心、讲团结爱祖国、讲贡献爱家园、讲文明爱生活”。总之，公民不应该批评政策和官员，向中共和习近平表示感恩和忠诚，反对任何威胁团结的事情，如批评党、国家、讨论独立自主或更大自治，把重点放在党确定的贡献上。（Richardson，2017）。

拉萨的西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褚小山解释说，“四讲四爱”宣传运动已经和一般的政治课程结合起来，鼓励青年帮助实现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梦”（邱加尼，2017；西藏日报，2017c）。

“四讲四爱”运动的目标和作用以及实施的强度、形式和频率与1996年以来在西藏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类似。这种意识形态运动的核心是压制西藏人民对西藏领袖达赖喇嘛的信仰和忠诚，并以爱国主义和对党和中国的忠诚代替为目的（Powers & Templeman，2012）。因此，这不仅是为了否定西藏人的意见自由，而且也否定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权利。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运动也旨在说服西藏人通过批评“落后”、“不文明”的西藏人身份而认同中国国家。那些指导政治灌输的人企图把西藏人洗脑成相信党的原则，包括消灭佛教，鼓励更广泛的“群众再教育”（国际西藏运动，2017b）。在很多方面，宣传运动类似于“思想警察”的工作，都是为了传播意见，规范平民的意见。中国当局试图增加对西藏人的影响力和控制权，剥夺他们自由意志的权利，以村庄为基础的宣传活动是整体群众监控计划的延伸。

虽然驻村干部系统原定于2014年结束，但被无限期延长，或许成为西藏人永久的生活。西藏的大规模监控工作原来是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领导下进行的，正是在陈全国的任期内，监控西藏人成了常态，并强制闯入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现任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先生复制了许多西藏自治区的监视技术到维吾尔自治区，并且不遗余力地在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高度规范的警察国家，就像他在西藏自治区实施的那样（Zenz & Leibold，2017）。在陈的接班人吴英杰的掌控下，对西藏人的监控计划不断发展，并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使更严重的践踏藏人的基本权利。

自动化监控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来革新监控方法，继续开展监控工作。生物识别技术在 2017 年受到重视，作为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监控计划项目中的新技术。然而，要强调的是，许多新的监视技术和举措早在其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实践中。一个例子就是使用由 iFlytek 公司创建的大规模自动语音识别和监控系统。2012 年，公安部开始建立全国发声模式数据库。2014 年，安徽省公安局下令加快数据库建设。早在 2015 年，语音识别技术就被用于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监控工作（HRW，2017c）。

语音识别技术引入监视西藏人带来了另外一个方面侵入性的监控。在执法数据库中，语音生物识别数据揭示了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从而导致控制其他个人信息，例如他们的种族、地址和旅行记录等。不像其他形式的生物识别数据，收集公民的声音可能不经过他们同意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警方官员可以谨慎地收集声音模式，同时获取其他生物识别数据，如指纹、尿液和 DNA 样本。通过这项技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电话接听系统中的语音，并作出相应的措施。在西藏，声音识别系统有可能协助中国官员对被释放的囚犯、流亡归回者、被拘留者、抗议者的家人和朋友等“关键人物”进行针对性的监控措施，尽管预计所有西藏人都受到语音识别监视技术的支配。

中国政府还从弱势群体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 DNA 和血液采集，这些弱势群体已经成为监测对象。由于监控计划使西藏人经常影响，他们很可能是受影响的群体之一。从既没有被定罪也没有被怀疑犯罪但被当作罪犯对待的公民中抽取样本。由于在中国缺乏可行的隐私权的保护，个人几乎没有权力拒绝提供这样的个人数据（HRW，2017b）。中国政府声称，该数据库将协助执法部门解决犯罪方面的努力。然而，有记录的案例表明，DNA 收集与解决特定的犯罪案件没有联系，而仅仅是获取公民的基本信息。除官员不允许个人有效表达对反对意见外，政府人员滥用数据库时，个人权利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

2012 年，中国有关部门在西藏自治区推出了“免费体检”，包括“血液检查，心电图检查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Jigme，2016）等 12 项检查项目。到 2013 年，该计划几乎涵盖了全西藏自治区的农村和城市人口（Su，2013）。免费的医疗保健计划是一方面承诺基本社会服务和维持稳定的整体社会管理战略的一部分。自 2011 年底以来，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西藏地区已经加强执行。联合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由于政府监督可能滥用其数据库，DNA 采集可能引起人权问题（联合国大会，2016 年）。还发现中国政府在提供免费体检的幌子下收集了维吾尔自治区 12 岁至 65 岁维吾尔人的 DNA 样本、指纹、虹膜扫描和血型。

(HRW, 2017a)

人脸识别系统是今年获得更多曝光度的另一种形式的生物识别监控技术，尽管有报道称这种系统早在 2005 年就已在中国实施 (Langfitt, 2013)。2008 年西藏发生抗议后，公共街道和寺庙内部安装有人脸识别系统。然而，在公共街道上使用人脸识别系统效果可能不明显，因为路灯会等作为外观隐蔽。如果中国达到建立高精度技术以实施跟踪个人的目标，对西藏的影响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西藏人已经一直处于监视之下。当政府怀疑他们的一举一动时，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极大地影响西藏人正常运作的的能力。图 20 显示了一个像玛尼轮(西藏祈祷轮)伪装的监控摄像机。

中国政府预计 2020 年将推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使公民通过各种监督手段获得的数据排名。2014 年制定了一份规划大纲将该系统描述为“基于覆盖社会成员和信贷基础设施的信用记录的完整网络”(Creemers, 2015 年)。与金融机构如何根据信用评分对消费者进行排名相似，该系统最终根据其诚意程度对个人进行评级。“真诚”的公民将有真正服从国家权威的行为表现，坚持同共产党与分裂主义者和反对派的斗争 (Lafitte, 2017b)。儒家传统认为，对行为的顺从性的修改无论是否真实，最终都会“教育心灵遵循”(Lafitte, 2017a)。对于西藏人来说，只要党国认为他们行事顺从，把党视为上级，那么他们就会达到诚意成为模范的公民。

社会信用体系努力树立“诚信文化理念，弘扬诚信传统美德”——鼓励信任和约束作为激励机制打破信任，其目标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思想和信用水平

“(Creemers, 2015)。社会信用通过奖惩结构，旨在为社会提供金融和社会保障。公民的评级因素包括工作表现，公共行为和财务状况 (Lafitte, 2017a)。对于西藏人来说，体现政权的官方口号有助于确定他们的诚意程度。例如，预防控制指的是“警务网络的建设和发展，在发生实际事件之前发现和处理威胁稳定的事件。还包括组织普通老百姓在村、社区、学校和工作场所招募安保队伍和组织公民巡逻，组织普通人员进行安保工作”(HRW, 2017e)。另一个消除看不见的威胁的措辞是指示所有“人员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任何可能的不稳定因素，即使它看起来还不是威胁”(HRW, 2017e)。

如果一个人的社会信用等级低，处罚包括限制旅行、使用草原、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和林地，就业以及获得政府福利或补贴 (Creemers, 2016a)。相比之下，奖励可以包括处理行政审批时的“快速”，在教育、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优先提供公共服务便利，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Creemers, 2016b)。通过社会信用体系，中国政府可以更好地跟踪西藏人，并加强对西藏人的控制。通过奖惩制度，西藏人将被迫采取某些行为来获得更好的机会。正面强化的效果可以显着

影响西藏人采纳党国意识形态或至少是假装同意。西藏人还是会被迫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两者都禁止西藏人自由表达。

作为一个没有法治监督的国家，随着中国和西藏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愿意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意见和行为反映了中国政府为实现其目标而对藏人采取控制程度严重性。不懈追求全面的大规模监视已经超出了中国所提供的合理化水平，不能相信这种方法是打击犯罪，确保国家安全。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证据显示这一条没有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04）。莱博尔德还强调，中国对监控的使用“不是对事件的回应，而是对未来的预测和规划”（J. Leibold, 个人通讯, 2017 年 10 月 27 日）。现在已经成为监控主要内容的先发制人措施只是中国当局继续侵犯权利的平台。莱博尔德进一步分享了他的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政策不幸成功了，但由于现在阻力只是小规模发生，所以党国的稳定感是表面的。这些政策的影响破坏了所谓少数民族之间的信任感，使藏人之间的不安全感日益增强，长期来看可能是极其不利的。在短期内，中国政府的运动可能奏效，但是否可持续是另一个问题。

数字通信和网络空间的控制

中国政府一直在控制数字通信和网络空间的活动。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西藏地区“天罗地网”这个词在网络上占据着越来越广泛的地位，涉及到在西藏阻止控制外国媒体播放和网络空间，说明了网络活动的监测成为不可避免（HRW, 2017e）。2017 年，网络限制和控制权的扩张严重影响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言论自由权。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极端的反分裂主义和镇压西藏人的方式使西藏的网络控制比中国控制的更为严重。中国对网络空间的控制力增加使个人在网上和移动平台上发表言论和分享意见的空间更小。

3 月 10 日的西藏抗暴日，中国府府发布了一项命令，切断所有互联网服务。该指令是由甘孜州政府发布的，其中包括：达孜多（康定）、达吾（道孚）、扎果（卢霍）、甘孜、石渠、德格、白玉、娘荣（新龙）、理塘和巴塘（RFA, 2017h）。在邻近的西藏自治区高度戒备的国家安全人员驻扎在该地区企图对藏人威胁和制造恐惧，以迅速回应任何爆发的抗议活动。互联网服务的关闭也是切断西藏境内外通信的预防措施，因为中国政府认为流亡藏人的活动会煽动境内藏人开展抗议活动。

今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 19 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大力进行了

防止西藏各地的网络交流，所有的互联网通信媒体都被封锁，以确保党的大会顺利进行（AFP & Lau, 2017）。许多西藏人无法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微信与西藏以外的亲属沟通，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中国政府发现他们与流亡藏人说话可能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9月14日至18日，中国海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召集所有西藏寺院的领导人到赤噶（贵德）县，并警告他们不要利用社交媒体来查看和传播“非法内容”，如有关西藏和达赖喇嘛的信息（RFA, 2017v）。如果发现违反禁令，并威胁对中国政府表达不忠诚的僧人将受到严重后果，西藏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作为加强对西藏境外信息传播的控制。

示例故事：

在访谈一位逃离西藏现居住在印度的西藏人觉囊福利协会会长仓阳嘉措时，介绍了他与西藏亲友沟通的经验。

“在西藏境内外藏人交流信息的能力方面，我看到了过去几年的巨大变化。之前在2012-13年，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更愿意分享信息，但现在变得非常困难。我曾经收到很多关于西藏人面临问题的信息，包括侵犯人权和政府镇压的第一手资料。但在2014年被中国政府控制的新闻频道“青海电视台”播出的一个有关自焚抗议活动节目中我被提名，从此一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个15分钟的中国政府自焚宣传的节目中，他们展示了我的照片，并采访了我家乡的一些老人，他们表示反对我所进行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我知道受访者被迫出现在节目中。这个节目还特别采访了七个西藏僧人其中3名来自觉囊寺，他们因为分享有关自焚的信息而被遭监禁。被迫僧侣对煽动自焚抗议作出虚假忏悔，并告诉他们如何伪造自称为自焚者的信件。中国当局通过虚假招供，诋毁自焚者所作的牺牲，他们想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我和其他所谓的“流亡的西藏分裂主义者”。

我所做的只是让国际社会知道藏人的自焚抗议和中国当局对藏人的虐待行为。记得我接触到西藏境内壤塘、果洛和阿坝发生的自焚事件。尽管存在风险，但他们联系我并要求我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媒体机构和人权组织。为了履行自焚者的愿望，以及他们为人民作出的重大牺牲，这是我所能做的一点小事。我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了国际社会，却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尽管我知道这可能会对我还在西藏的亲人产生危险的影响。我不后悔我做了什么，但收集西藏侵犯人权信息来源最大的困难就是藏人遭酷刑和拘留的信息。

节目播出后，我的弟弟被拘留审讯了三个月，我的妹妹，她是个教师也被传唤了五、六次。他们两人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审讯，收集有关我的背景和在印度的信息。我的家人一直遭到监控，当地政府在我村200多户人家的村庄里举行了无数次的

会议，村里的藏人得到了严令，警告与我保持联系或者与我讨论是非法。从那时起，我的家人、亲戚和其他熟人都在微信上封锁了我。

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我注意到有不少西藏人退出了西藏的微信群。一些人告诫他们的朋友避免谈论敏感问题，而另一些人则采取阻止通常更直言不讳的朋友的帐户“(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7 November 2017)。

通讯限制在西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审查和监控微博、微信、中国微博网站等在线发帖，因为在中国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等其他流行应用程序被禁止。在线上避开政府限制的流行方法是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虚拟专用网对许多访问涉及民主运动或有关西藏问题等议题的外国网站者来说至关重要(Haas, 2017)。VPN 也可以避开政府的审查，也就是所谓的防火墙，允许用户访问被禁止的网站。政府官员知道防火墙的弱点，允许使用 VPN。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国已经命令三家国有电信公司在 2018 年 2 月之前全面封锁 VPN。

对 VPN 使用的定罪是遵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1 月份发布的通知，要求所有的特殊电缆和 VPN 服务获得政府批准。这是针对未经授权的互联网连接进行为期 14 个月的全国性整顿运动的一部分，预计将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结束(Ye, 2017)。外国公司也屈服于压力，例如，7 月，苹果公司决定从中国的 App Store 中删除所有主要的 VPN 应用程序。苹果解释说，他们的移除是“必需的”，因为这些应用程序违反了中国法律(Russell, 2017a)。VPN 应用程序的非法化已经有效地结束了中国互联网用户不受限制地访问互联网的唯一途径。这将使中国当局能够更好地控制公民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将对西藏的观点更走向主观和片面。

网络法律和法规

6 月 1 日，中国的网络安全法生效。现在法律要求网络运营商在中国储存选定的数据，并允许中国当局对公司的网络运营情况进行抽查(Wagner, 2017)。虽然法律更侧重于网络层面而不是个人层面，但是却反映了公民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利倒退。该法律的动机是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恐怖主义和黑客威胁，但是，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和模糊，任何人都可能以保护“网络安全”为借口被任意逮捕(Reuters, 2017 年)。例如，第 12 条表明，如果西藏人讨论自由或人权问题就会应用：“任何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中国人大网，(英文为翻译) 2016)。

《网络安全法》相应中国政府在其范围内管理互联网的广泛努力，树立所谓的“互联网主权”概念，重新定义共享的全球网络空间。之前网络运营商在法律面前有更多的自由来决定是否遵守政府的要求。随着新法的实施，如果网络运营商拒绝遵守政府要求，将会被追究责任和罚款。例如，中国的刑事调查或安全部门要求网络运营商与他们合作，并提供数据库的访问权限和“技术支持”，他们可能会服从，因为拒绝总是会导致报复，他们的业务将受到影响（Wagner, 2017）。尽管中国的“互联网主权”概念似乎不可行，而且与“全球网络”的全球信息空间相矛盾，但似乎中国政府暂时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为许多公司正在网络安全法框架内工作，而不是离开中国（Denyer, 2017）。

网络安全法实施不久，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CAC）于8月25日发布了四项新的《规定》实施细则，对互联网使用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该规定适用于所有在线互动，如互联网论坛，留言板，群组聊天和新闻评论（Sacks, 2017）。在四部规定中要求个人用户的真实姓名登记与身份证明和公安的文件。名称注册与社会信用体系密切相关，因为在线支付系统与需要有效电话号码，国家身份证件和其他个人信息的个人银行账户绑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也降低，在中国网络匿名的能力已经基本消失。

图 4 给出了四部新规定概述，其中一些条款为例。

图 4：来源：Sacks（2017）。

<u>《规定》</u>	<u>条款</u>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	第八条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u>《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u>	第九条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建立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的信用档案和失信黑名单管理制度，并定期对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进行信用评估。
<u>《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u>	第六条对使用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件号码、移动电话号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使用者信用等级管理体系，根据信用等级提供相应服务。
<u>《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u>	第六条和第七条：对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不得为其提供信息发布服务。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使用者信用等级管理体系，根据信用等级提供相应服务。

9 月 7 日，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CAC）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要求群聊管理员负责群组管理（“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2017 年）。这一要求在互联网集团信息服务条例的管理规定之内，将影响微信、QQ、微博、群组、街头群、支付宝群聊等互联网群体等服务提供商。法规还要求服务提供者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西藏行动研究所的数字安全专家洛桑嘉措斯踏（Lobsang Gyatso Sither）说：“现在，

西藏人不得不自我审查，即使他们真的想在外面分享信息，所以他们在发言和交换意见之前要更加谨慎，以免影响他们的社会信用体系，因为最后的社会信用体系会让你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更容易的签证、更容易的护照、更容易的银行贷款等。人们三思“如果我说错了，我的社会信用评分会降低吗？”这是人们如何自我审查自己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少有人会承担低社会信用评分的后果。“(L. Gyatso, 个人信息, 2017 年 11 月 8 日)。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互联网警察发布通知，并从 10 月 8 日起施行，当地版本的信息披露政策和互联网组织规定。通知明确指出：所有在线聊天群组管理员和公众在线账户的所有者应负责“严格管理”群组成员及其发布的信息。他们还负责严格防止“非法”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 (TCHRD, 2017a)。通知中包含九条指令，禁止就港澳台专题进行讨论，并分享中国警方暴力的“虚假录视频”。根据通知，如果一个聊天群或互联网小组确实包含任何禁止的活动，那么管理员和分享信息的人“将由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中国法律类似“国家机密”或“非法信息”的模糊含义，中国政府将人权与和平异议定为刑事犯罪。

以下是通知中列出的九条规则的翻译 (TCHRD)

下是通知中列出的九条规则的翻译：

- 1, 禁止共享包含政治内容的信息
- 2, 不相信谣言，也告诉他们
- 3, 不共享包含机密信息的内部文件
- 4, 不分享包含色情，吸毒，暴力等信息
- 5, 在政府网站上发布之前，不要共享与港澳台相关的信息
- 6, 禁止分享相关军事信息
- 7, 禁止共享包含国家机密的文件
- 8, 禁止分享亵渎警察形象的假视频
- 9, 禁止分享其他非法信息

聊天群组

2017 年 10 月份，泽库县公安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召集 248 名不同网上聊天群组的管理员。在研讨会期间，聊天群组管理员被责令监督和管理聊天群内的每一个讨论，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不遵守这些指示将会有严重的后果。。讲习班的老师解释了过去被捕的很多聊天群组管理员的案例。随着新的互联网条例的颁布，管理员被警告说现在正在当地公安局官员的直接观察所有派出所正副所长和聊天组管理员们签署的保证书，保证不允许网上出现“非法”活动和内容。同时，聊天组管理员还就习近平法治国家愿景的意义以及众多的互联网管理法规进行了学习（青海电视台，2017）。

随着在线聊天群体的严格管制，越来越多的西藏人离开了各种聊天群体。一位藏人记者在印度为一家藏文报纸工作，在西藏的家人被一个设在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聊天群组管理员有礼貌地提出问题，由于家人高度的担忧而离开这个聊天群组。记者补充说：“我不认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我知道西藏的很多其他人离开了这些聊天群组。就目前而言，似乎一对一的在线沟通是安全的，虽然不能确定（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1 December 2017）。居住在尼泊尔的另一名西藏人指出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家人和亲属离开聊天群组，西藏的藏人离开聊天群组人数异常增加。由于不了解新的规定，他认为这是十九大期间加大限制所需要的临时情况（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6 November 2017）。随着越来越多的西藏人了解到微信在审查中，并逮捕了用户，一些藏人开始使用被认为是更安全替代方案的 WhatsApp，只是发现它在西藏被封锁。一位在印度的西藏作家于 2017 年 11 月发现，他只能发短信和图片和视频，但在与西宁的朋友沟通时却无法使用语音信息。[Anonymous, Personal communication, 17 November 2017, New Delhi, India]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必须遵守有关内容监控的法律法规。未能控制和过滤不需要的内容可能会导致罚款或吊销运营许可证，其中，微信是西藏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程序之一，也是全球第四大信息应用程序，拥有 8.46 亿活跃用户（Russell, 2017b）。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微信长期以来对信息交流中被视为敏感的关键字进行了过滤。关键字审查是不透明的，如果用户的消息中包含一个被阻止的关键字，用户不会得到任何通知，这个消息就不会出现在接收端。十九大召开之前，微信阻止用户更改昵称，个人资料照片或标语，直到十月底。

示例故事：

2017 年 6 月，唐克索桑寺现年四十岁的西藏僧人噶丹扎巴和三十六岁的洛桑西

热因被指控“与外界分享信息”和“煽动分裂主义”罪被送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监狱。楚曲（黑水）县人民法院对噶丹扎巴判了5年徒刑对洛桑西热判处4年徒刑，他们被剥夺了聘请辩护律师的权利，并不允许其家人出庭旁听。2016年8月24日午夜，中国安全人员任意拘留了两名僧人，并指控与外部人员分享了当地政府征地而遭到唐克镇噶哇玛村牧民抗议活动的信息。（TCHRD，2016a）。

5月4日，娘荣（新龙）县德帮寺的43岁的僧人贡宝被拘捕。他被怀疑与外界外分享有关西藏抗议的消息，政府没有告知他的家人和亲属关押的地点、或他的状况（RFA，2017）。

和平抗议

中国政府几乎不可能让西藏人在线上和线下和平表达异议。虽然《中国宪法》第35条保障集会自由的权利，但实际上在西藏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早已被定为刑事犯罪。中国地方政府经常批准武装警察和人民解放军等残酷镇压西藏人的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并遭到殴打、杀害和任意拘捕许多示威者。在极其有限的行使和平集会权利的空间中藏人采取了自焚抗议、单独上街抗议等其他形式的抗议。随着中国当局实施对抗议者家属、亲属等集体惩罚和极端报复政策，即使这种惨烈选择中国政府也试图迫使封杀。镇压自焚事件而发展出来的单独上街抗议活动，使抗议者面临强迫失踪、酷刑和法外处决的风险。

尽管中国对西藏抗议者镇压的力度不断加大，但2017年，有4名藏人单独上街抗议。

- 索南扎西（20岁）1月5日在色达县城的主要街道上举行和平单独上街抗议之后被任意拘留。这位年轻人散发抗议传单，并高呼“达赖喇嘛尊者万岁！”，“西藏自由”等口号，抗议活动恰逢1月3日至15日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期间。中国政府开始加大了对当地藏人流动限制，以此来禁止藏人参加达赖喇嘛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由于部署大量的安全人员，也造成了大规模的监控，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有关索南扎西的消息。（TCHRD，2017t）。

- 2017年2月25日，阿坝县格尔登寺的一名年轻僧人洛桑次臣举行和平单独上街抗议，他高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并提出呼“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的口号。僧侣的抗议录像显示，两名公安人员立即强行将他带到一个秘密地点（RFA，2017）。在录像中，看到洛桑次臣背朝着相机走去，高举着达赖喇嘛的法像。一名不明身份的西藏妇女因拍了洛桑次臣抗议的录像而遭拘捕（TCHRD，2017j）。到目前洛桑次臣下落不明。

•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达杰在 3 月 16 日当地人称为“英雄之路”的阿坝县城街道上进行了单独上街抗议。消息来源说，这位僧人呼喊“西藏自由！”和“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由于“敏感”月中国政府在该地区部署了大批安全官员。据报道，在举行抗议活动之前，洛桑达杰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写道：“不要忘记 3.16”，暗指 2008 年 3 月 16 日在阿坝发生的大屠杀（TCHRD，2017j）。

•两个孩子的母亲多贝在 3 月 18 日在“英雄之路”进行了单独上街抗议，当地警方立即逮捕了她，多贝是阿坝县人，目前仍然下落不明（TCHRD，2017j）。

虽然，上述单独上街抗议的状况和下落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他们很可能是在审前拘留或被秘密监禁。

示例故事：

2017 年 4 月，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嘉措（23 岁）服完他 3 年刑期后出狱。马尔康中级人民法院以高举手工制作的西藏国旗，高呼口号呼吁“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自由”举行和平单独上街抗议判而入狱。禁止他的家人聘请辩护律师，但被传唤旁听审判（TCHRD，2017 年）。

自焚抗议

由于西藏人被剥夺了通过抗议和平表达自己的权利，遭受了酷刑和监禁，许多人采取自焚等方式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压迫政策。自 2009 年 2 月 27 日以来，共有 152 名藏人在西藏境内自焚。西藏内外已知自焚总人数为 162 人。2017 年有 8 起自焚事件，其中 6 起发生在西藏境内，2 起发生在印度。西藏境内自焚者最常使用的口号是“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自由”，这反映了西藏人真正的愿望，即许多人只能在自焚抗议中表达自己的意愿（ICT，2017e）。

3 月 18 日，一名叫白玛坚参的 24 岁农民，当地时间下午 4 点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娘荣（新龙）县措卡寺附近自焚抗议。白玛坚参的自焚抗议是 2017 年在西藏境内首起自焚抗议事件。他在自焚抗议时呼吁“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自由”（RFA，2017hh）。中共公安人员赶到并强制带离了现场并采取了安全措施。因 3 月 10 日西藏抗暴纪念日，整个甘孜州微信应用程序以及互联网被封锁，甘孜州的 18 个县（市）中的 13 个县互联网服务被封锁。自焚事件增加了警察的巡逻。白玛坚参被带到四川省首府成都的一家医院，虽然许多人认为他已经死亡，但后来在 3 月 22 日证实他还活着，但情况危急。在他自焚之后，白玛坚参的亲属前往甘孜公安局要求见他，在中国一个普遍和典型的回应——拘捕并严厉殴打了他们，同时强制整夜拘押在拘留所（TCHRD，2017f）。第二天，由他们各自的乡镇官员提供担保后他们被释放。然而，他的亲戚患有腿和脊髓急性疼痛。白玛

坚参的自焚事件是娘荣发生的第二起自焚抗议事件，标志着西藏境内外第 155 名藏人自焚抗议。

旺秀次丹，是一名 39 岁的父亲，当地时间 4 月 15 日凌晨 7 时在西藏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一个公共广场自焚。旺秀次丹在焚烧时高呼达赖喇嘛尊者长寿（RFA，2017e）。警察和安全官员迅速到达扑灭火带走了旺秀次丹，旁边站着围观者。由于该地区的通信受到严格的控制，关于旺秀次丹自焚的信息非常有限，不知道他是否在抗议活动中幸存下来（ICT，2017a）。自焚事件发生后不久，当地警方拘留了 5 名藏人，其中两人涉嫌拍摄自焚事件，他们的身份等情况仍然未知。另外三人因为发现拥有旺秀次丹的手机而被拘留。已知的三名分别是：贡曲坚赞、尼玛和次仁嘉措，三人都在受到严厉殴打，其中两人已被释放，一人被确认仍被拘押。5 月份，在白玛坚参和旺秀次丹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后，有报告显示在甘孜地区加紧限制行动并加强对互联网使用的监控。希望前往甘孜县的藏人必须获得特别许可。地方政府警告藏人不要与外界分享自焚照片和视频，否则将被判处 15 年徒刑。中国政府加强了寺院、社区和学校的政治教育课程（RFA，2017z）。

恰多嘉，16 岁，来自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桑曲（夏河）县博拉镇的农民家庭。5 月 2 日，恰多嘉自焚抗议高喊“达赖喇嘛万岁！”、“西藏自由！”、“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在他倒地之前跑到了博拉镇的中国政府办公室前，中国军警赶到现场并扑灭恰多嘉身上的火后被带走（RFA，2017ee）。恰多嘉的家属被要求回答他的自焚抗议的原因，他的父母和妹妹被拘留但是当天晚些时候他们被释放。但是恰多嘉的父母后来又被拘留，尽管第二次被拘留的日期和目前的地点仍然不得而知。恰多嘉的妹妹患有心脏病，自从释放后一直卧床不起（TCHRD，2017b）地方当局继续骚扰恰多嘉的家人，阻止他们举行祈祷恰多嘉的宗教活动，并阻止亲友访问对死者家属表示哀悼等（RFA，2017z）。5 月 19 日，一个西藏流亡社会的新闻网站声称恰多嘉已经去世，中国官员已经秘密火化了他的尸体，尚未将他的遗骸归还给他的家人（Tibet Times，2017 年）。

嘉央洛赛

5 月 19 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22 岁的僧人嘉央洛赛自焚抗议之后去世，他在尖扎县政府医院附近自焚抗议的。当地安全官员没收了他的遗体，随后在自焚抗议现场部署了武装警察部队。抗议之后互联网线路仍然不稳定，受到越来越多的监视。警方没有回应他的家人要求归还的遗体之要求（TCHRD，2017b）。

丹噶

今年 63 岁的西藏僧人丹噶自焚抗议而去世。丹噶于 11 月 26 日在甘孜县呼吁“西

藏自由!”。武装警察立即赶到现场夺走了丹噶的遗体（ICT，2017d），他的遗体没有归还给其家人。自焚抗议发生之后在该地区进行了严密的安全措施，警方驻扎在丹噶家周围。电话和互联网线路仍然受阻，试图阻止从西藏以外获得进一步的信息（RFA，2017p）。

贡贝

12月23日，一名30岁的西藏男子贡贝在阿坝县城自焚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压迫。第二天早上当地警方将他带走被送往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的一家医院。在社交媒体上播放的录像显示贡贝正在熊熊大火中奔跑。为了尊重和表示团结当地藏人于12月24日和25日在阿坝县关闭了商店和酒店，以此表示支持和哀悼。贡贝去世之后他的父亲嘉杰被马尔康当地警方拘押，借口是他需要在医院解决与贡贝医疗相关的账目。在本刊物发表时，嘉杰的情况仍然未知（TCHRD，2017c）。

丹增切央

印度瓦拉纳西中央高等学院19岁的学生丹增切央于7月14日高喊“西藏必胜！”自焚抗议。他后来被带到医院，但在7月22日因受伤严重而去世（RFA，2017cc）。

巴桑顿珠

7月29日，达兰萨拉罗布林卡研究所一名49岁的画家巴桑顿珠自焚抗议。他自焚，拉嘉日附近的转经路旁喊“达赖喇嘛万岁！”。他在自焚事件发生的现场去世（ICT，2017e）。

自焚抗议者出狱

西藏自焚抗议者洛桑贡曲和洛桑格桑今年分别在不同月份出狱。这是他们自2011年被当地安全部门拘留以来的第一个消息。两名僧人于2011年9月26日在阿坝县城同时自焚抗议。当时18岁的自焚抗议者洛桑贡曲今年3月28日释放出狱，在四川德阳监狱中一条腿被截肢。对他以未知的罪名拘押了5年零6个月。出狱后不能回到他的寺院，并受到范围广泛的限制。洛桑贡曲在被拘押期间情况危殆，无法正常吃饭，家人被告知他的双腿和双臂都被截肢等。他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也遭到歧视和敌视，中国医院的工作人员贬低他是“国家的敌人”和“社会稳定的敌人”（TCHRD，2017）。7月29日，洛桑格桑出狱，他和洛桑贡曲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他被拘押了6年（Voice of Tibet Radio Service，2017）。正如去年在阿坝县所有寺院分发的一项政府指令所宣布的那样，这些僧人很可能是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指控囚禁的。

5月10日，24岁的自焚抗议幸存者洛桑嘉措在服完5年零3个月后出狱。2012年2月13日，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嘉措在阿坝县高呼“西藏自由！”之后自焚抗议。他烧伤但幸免于难，之后遭到中国安全人员的严厉殴打，并被囚禁。在抗议现场三名藏人，其中两名俗人和一名僧人也遭到毒打。其中一名俗人设法逃脱，另一名头部和手臂受伤流血被安全部队带走（RFA，2017bb）。

结论

隐私权得到普遍认可，必须在法律和实践中得到保护（U.N. General Assembly, 2014）。侵犯隐私权会影响其他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权利，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其中一些违规行为源于监视的寒蝉效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保护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于2001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普遍承认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是联合国的基本组成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七条也规定了保护公民隐私，家庭，住宅和通信。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中国应尊重这些公约所保护的权利，并确保中国法律保护隐私权。由于缺乏其他辅助立法和隐私的明确定义，中国《宪法》规定了有限的隐私权保护范围。为了加强隐私权，中国宪法应明确保障作为宪法权利的隐私权（Cannataci, 2015）。

任意拘留和酷刑

任意拘留的定义是:因没有正当理由或没有法律程序而被拘留 (Amnesty International, n.d.)。西藏人长期以来因行使人权遭受无限期,任意拘留和酷刑。执行大规模监控方案导致任意拘留受害者的藏人人数攀升,并伴随着酷刑,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等的后果。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监视使西藏境内的藏人更加难以与外界分享有关任意逮捕和其他侵犯人权事件的信息,而且分享信息越来越危险。虽然,中国政府声称被逮捕和拘留的藏人有违法行为,实际上这些藏人只是把自己的基本权利当作是人权而被政府贴上了“非法”的标签。《中国宪法》第 37 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4)。尽管有宪法规定,但中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侵犯人身自由等的行为提供理由,而且证据微乎其微。

西藏人除了遭到不公正的逮捕和拘留之外,往往被隔离监禁,家属不知道他们的所在地等情况,这既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规定,也违反了国际法的规定。在被拘留期间,西藏人被剥夺了合法代理权,接受不公正的审判,有时也不会审判。中国政府迫害涉案律师,对敢于捍卫西藏人权利的中国律师经常进行骚扰、恐吓和注销执照等 (TCHRD, 2016d)。对西藏人而言两个普遍存在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这两项指控都可能导致长期的徒刑。然而,有很多案件审判没有任何的结果,藏人继续被单独关押多年。西藏的大多数任意拘留案件几乎总是被隔离、未经确认和未定义,目的是将被拘留者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也可以将其定义为强迫失踪案件。西藏政治犯的记录通常以遭受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方式逼供,以及剥夺独立法律顾问,医疗和公平审判权。

许多被任意拘留的西藏人是政治犯 (TCHRD, 2016d)。政治犯也可称为人权捍卫者,因为他们努力在其社区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和平促进人权 (OHCHR, n.d.)。政治犯又被称为良知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或他们的信仰而被监禁 (Amnesty International, n.d.)。以前西藏的僧尼是政治犯的主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政治信仰被监禁的人越来越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

心的政治犯数据库显示自 1991 年以来共有 5073 名政治犯。这个数字预计会更高，由于信息钳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限制，难以获得准确数字。图 XX 显示了 XX 页共有 18 个确认的 2017 年政治犯。

案例：

扎西旺秀

自 2016 年 1 月 27 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多一名 32 岁的商人兼藏语言维权人士扎西旺秀（又译扎西唯色）被审前拘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他被任意拘留并被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事实上他只是倡导主张保护和推广藏语言文化（Wong, 2017）。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最少 5 年最长 15 年的监禁。扎西旺秀被关押两年多后，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在玉树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审判结束时“法庭宣布该案将另行择期宣判”。法庭用九分多钟的纽约时报纪录片《一个藏人追求正义之路》作为对扎西旺秀罪证。这部纪录片记录了扎西旺秀倡导西藏语言教育，并试图起诉地方政府未能保护藏语言文字。审判持续了四个小时，扎西旺秀否认了“煽动国家分裂”的指控，并补充说：“「他不是试图分裂国家」而是在行使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他想利用国家的法律制度保护西藏语言文化，而不是煽动分裂国家。扎西旺秀的两位中国律师梁小军和蔺其磊也进行了无罪辩护，中国律师梁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引述说：“检察官意识形态太强大了”。梁的言论揭露了这一指控政治化性质（Buckley, 2018）。扎西旺秀的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愤慨，然而他和其他许多西藏拘留者一样，在等待封闭审判的裁决之后继续被任意拘留。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80 届会议裁定扎西旺秀是任意拘留，并呼吁释放，因为它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A / HRC / WGAD / 2017/69）。

蔡贡加

蔡贡加（又名刚雄阿才），一个著名的西藏前政治犯，2016 年 12 月 24 日被中国政府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组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至 28 日召开的第 78 届会议上通过蔡贡加案意见。于 2017 年 2 月 3 日向中国政府转达了有关蔡贡加的通知。但是并没有收到截止日期 2017 年 4 月 5 日前回复，也没有提出延期申请（A / HRC / WGAD / 2017/4）。因为如果有真实可靠的资料说明被拘留的人正常犯罪而受到惩罚，工作组称政府有责任提供定罪依据的具体证据。工作组在分析了蔡贡加被拘捕的事实后认为：剥夺蔡贡加的自由是任意拘留，并要求中国采取行动纠正，并按照《世界人权宣言》所述的国际准则行事。2017 年 5 月 3 日，蔡贡加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闭门审理。没有允许邀请辩护律师，自从 2016 年 12 月被任意拘留以来他的家人和亲属至今没有被允许与他见面。审判没有任何裁决结果，蔡贡加现在刚察县看守所，由海北州国家安全局羁押。

自3月18日白玛坚赞自焚之后，约有200名甘孜县藏人被羁押。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近200名藏人企图通过声援白玛坚赞的抗议活动而被遭拘捕。警方还没收了被拘留者的手机。”被拘留者的身份和状况仍然未知（RFA，2017j）。

7月2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布若寺院的一名高僧珠古洛桑被警方传讯任意拘留。一位采访者说：“他们叫珠古洛桑到达孜多（康定）的办公室，到达达孜多后被穿便衣的警察拘捕，没有任何理由而被拘留。”在中国官员和寺院的经理陪同下珠古洛桑回来只是为了找回他的身份证。高级僧侣和社区代表去了达孜多寻求释放珠古洛桑，但没有成功。珠古洛桑现况以及指控等至今无人知晓（RFA，2017p）。

2月27日，一名50岁的西藏僧人，穆拉寺医院院长克珠被中国警方第二次扣留在西藏安多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克珠被县公安局办公室传唤，到县公安局办公室领取他第一次被捕并羁押时没收的个人财物。克珠的家人等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尽管公安局官员没有解释他的秘密拘留，但当地的西藏人士提到，中国当局指控克珠在社交媒体上张贴了达赖喇嘛的教诲，写博客表示声援色达佛学院批评政府驱逐学院僧尼，并发表其他西藏人撰写的类似著作（TCHRD，2017h）。

30岁的降巴曲杰7月在昌都察雅县的曲瓦寺参加次曲祈愿活动时被拘留。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他在活动期间向乡警方报到，他到达乡派出所后被警方拘留，殴打，没有拘留的任何理由。降巴曲杰被关了两天，审问了他的兄弟阿旺强巴，因为阿旺强巴从西藏逃到印度后最近移居澳大利亚。当警方无法获得任何与他的兄弟联系的证据后他被释放。据称当局在被释放后几天就召唤了降巴曲杰取回他在被拘留期间没收的手机。执法部门警告他为了自己的安全不要联系阿旺强巴，因为他是“达赖集团”的积极合作者（RFA，2017k）。

酷刑

西藏政治犯经常遭受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并且经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长期健康影响。虐待和酷刑通常是在讯问和预审期间进行的更频繁，以此提取供认指控。藏人服刑期间也确实存在酷刑，整个拘留中心和监狱中的酷刑是猖獗的，藏人意识到一旦被拘留他们很可能会受到酷刑。虽然并不详尽，但监狱官员使用的酷刑设备是手铐、脚镣、警棍、电棍；战术包括“老虎登”。使用各种工具，如金属棒、铁棒、踢、拍打、严重殴打等，并经常任何方便的打击，如烟灰缸或椅子、电击、单独禁闭。将被拘留者暴露在极端温度下、被吊在天花板上、被剥夺睡眠，食物和水，使用毒品，嘲讽和威胁遭受酷刑和死亡（HRW，2015）。

今年 1 月 24 日，中国政府回应了 2016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对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国报告结论性意见的评论》。中国引用《刑事诉讼法》第 83 条，否认了对辩护律师权利的压制，以及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HRIC, 2017)。中国进一步声称，他们的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加强对被拘留者与律师见面权利的保护，并通知家属”。但是，大多数西藏案件的问题是，第 83 条也允许执法人员长期扣留西藏人而不通知家属或提供律师，因为他们总是被指控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且证据不足。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的被拘留者，可以最多合法羁押六个月。然而，西藏有很多案件拘留者来一直被单独监禁和未经确认拘留多年。在酷刑调查和受害人有权得到赔偿方面，中国方面提供了含糊和欺骗性的解释，其中包括提及 2015 年对禁止酷刑委员会的答复。答复题为 CAT / C / CHN / Q / 5 / Add.2 的英文译文规定：

“对被拘留人员进行健康检查或者在为被拘留人员提供待遇的过程中发现可能由酷刑造成的伤害的医生可以报告公安机关或者驻扎在看守所的监察部门。有关部门将依法进行调查，确认有关情况属实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HRIC, 2015)。

中国也否认了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拘留和酷刑，以及他们被禁止与外界接触的事实，尽管这些虐待行为已经得到核实并提供给国际社会。

藏人继续在拘留中心和监狱遭到酷刑，中国政府尚未向遭酷刑受影响的人提供赔偿。对那些实施酷刑和剥夺无辜生命负责的人还没有被绳之以法。酷刑是非常普遍的，经常是用来逼供拘留者手段，并以被拘留者为标榜，对整个社区进行恐吓。正如下藏人酷刑受害者的证词所表明的在西藏使用酷刑是有系统和广泛性。

案例：

30 岁的图丹旺秀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被任意拘留，因为他们分享了关于 3 月 16 日在阿坝县格尔登寺的僧人平措自焚的信息 (ICT, 2011)。一群武装警察开着三辆车从阿坝县拘捕图丹旺秀，并且把他押送到了汶川县的国家安全局拘留中心。他被隔离监禁，未经审判被羁押 1 年零 5 个月。在汶川国家安全局拘留中心关押了 7 个月，之后在马尔康公安局拘留中心羁押，他的家人一无所知，没有让律师见面。最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 3 年有期徒刑。他在德阳监狱服刑。图丹旺秀 2017 年 12 月抵达印度时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提供了以下证词：

“我原本阿坝人，但是我出生在拉萨，家里已经创业多年了。作为一个孩子，我被送到印度去西藏难民建立的一所学校接受西藏教育。后来我被认为是格尔登寺

住持的灵童，之后我离开了学校成为了一个僧人。2009 年，我决定脱下僧服离开印度回到西藏的家庭。在 2009 年年中我与拉萨的家人团聚后 2010 年 3 月前往阿坝在那里我学习了一些传统的藏药，并且在冬季学校假期藏人孩子学习藏语的学校做志愿老师。

2011 年 3 月 16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当我听说一个叫平措的僧人自焚时，我正在格尔登寺附近散步。而一些僧侣已经设法从当地警方的手中夺回了平措，这些警察试图夺走僧人烧焦的遗体。然后我从他同学和其他僧侣那里了解了更多的关于平措的故事，并亲眼目睹了自焚事件。与僧侣交谈约十五分钟后，有六十名藏人到达自焚场所，其中一名男子向警方投掷石块。为了保护石头投掷者其他人相互推挤，以致警方无法识别该男子。人群开始喊口号，发出抗议的呼声。甚至一些西藏人不断扔石头，警方感觉到他们是寡不敌众的。情绪高涨，藏人越来越多，决定到县公安局门口进行示威，僧侣们带队示威。示威前僧侣们宣布一切行动都要非暴力，不管来自警方的什么挑衅，西藏人都不会对暴力作出反应。“即使警察来杀我们，我们也不会诉诸暴力，因为这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望！”僧侣告诉人群，每个人都一致同意。示威者在四名僧侣的带领下前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当示威者靠近县公安局办公室时，我看到许多便衣警察突然进入视野，手持各种武器，包括棍棒、尖刺警棍、警棍等等。有人在电话中大喊大叫，指示同事四面包围示威者。不久，我们发现自己被武警四面包围着，他们用汉语互相呼喊接近手无寸铁的西藏人，“抓住他们！打！”武警猛烈抨击藏人，用上述武器殴打西藏人，肆无忌惮地殴打西藏人。整个人群彻底混乱，武警继续殴打示威者。不久，示威者中的年轻人便开始四处散开，以逃避警方暴力事件。最后，只有老人和僧人留在现场，超过五六个武警对付一个西藏人。我看见一名至少 40 岁的妇女被六名武警用一枚警棍打伤。然后，僧人继续高呼口号，达赖喇嘛的长寿、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自由等，甚至有人坐在地上。僧人们尽管受到武警的袭击但继续高喊口号。有一个僧人在高举拳头表示抗议。武警试图强迫僧人把拳头放下，就在这时，又有一名武警赶来了，多次用尖刺棍子打了他的头，血液流满他的脸和脖子上，僧侣挣扎着举起拳头，但徒劳无功，慢慢地转过头，朝着别的藏人仿佛他在告诉我：你还会不会看我们这样？你会不会来加入呢？那一刻我感慨的看着流淌着血的僧人举起的拳头倒在了地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刚刚目睹了警察杀了一个僧人，我看到许多人受伤和死亡。我想，如果我不能为我的国家和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至少可以让世界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假思索的用手机打电话给印度的朋友告诉他们我目睹的事情。我甚至没有想到我的电话是在中国登记的，这意味着我可以很容易地被监视和逮捕。

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后的 3 月 18 日，我在阿坝县城的三轮车上遭到武警的拦截，他们把我抓起来。我一上车就戴上手铐，指着照片说：“这是你吗？”我点了点头。然后我立即被带到了阿坝地区的旧军营（建立了一个新的军营）。他们让我

脱衣服，寻找隐藏的物品。然后，他们带来了一些旧衣服让我穿上。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遭到严厉的审讯和殴打。首席审讯人员是来自阿坝县国家安全局（SSB）的一名军官，他们说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要承认一切，因为在审判期间这样做对我会有帮助，我的刑期也会减少。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天真地以为用自己的手机打给印度的电话，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呢？我的沉默激怒了一名军官他突然向我投掷烟灰缸，我设法躲避。然后两名军官从两边抓起我，其他军官开始殴打和踢我的身体，包括肚子、腿和胸部感受到强烈的疼痛。打了差不多30分钟后他们决定把我交给国家安全局进一步调查。一个小时后，黄昏时分，他们把我带到了成都附近汶川县。我被带到了汶川新的国家安全局拘留中心，这个中心在2008年到2009年间建成。新的拘留中心由两建筑组成，一个三层建筑和平房建筑相邻。三层楼里包括审讯室和官员休息和睡眠的设施。平房建筑也有一个地下空间，有6个房间用作拘留牢房。我第一次被带到三层楼的顶楼。头三个小时，我接受了三名军官的讯问，其中包括审讯员、记录员和口译员，只有翻译是藏人。我被问到了印度的流亡社区，达赖喇嘛和在印度的生活，以及我在那里做了些什么。起初他们不说我被捕的原因，很好地对待我。接下来又是一个由审问者，记录员、口译员组成的审讯人员，他们的表现得不好，而且很有侵略性。他们威胁说，如果不承认会被判重刑。早上六点左右，我被押送到汶川看守所起一直审讯我。除了微薄的午餐外，大约早上六点钟到第二天早晨，我都没有睡觉或洗澡，还是决定即使他们杀我也不承认。整个审讯过程中，我的手脚绑在一张“老虎凳”上，我可以感觉到手腕剧烈的疼痛。为了让我承认，他们然后使用另一种策略。他们用手铐把我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双手铐在背后，双脚离开地面。当时我体重差不多200斤（约100公斤），身体的重量加重了疼痛。最重要的是，自从我被拘留以来没有睡过已经超过了24小时，衣服被汗水淋湿了。然后他们终于告诉我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知道我联系过的人。然后他们讲述了我分享的一部分信息，并要求我告诉剩下的部分，那是我意识到他们知道一切。我无法隐藏任何东西，所以我放弃了。然后他们用剥夺睡眠方式处罚我，每当我睡着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电棍或打耳光。他们会问我是否犯了这个或那个罪行，我会不由自主地说“是”，因为我只是想睡觉。就在我说‘是’的那一刻时候他们会确保拍下来，以便他们有我的认罪证据。然后他们给我读了我的认罪声明，并要求我签字。我的身体和心理都非常疲惫、昏迷，不能理解正在读的东西。为了睡一会儿我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签署了声明。最后他们让我在凌晨三点半睡觉，但是早上七点半醒了。

审讯一直持续到3月21日，得到了我的认罪就被转移到了附近的平房建筑被关在六个地下牢房之一中。我看到了招牌，被命名为四川第二看守所，我被关了七个月。对我的审讯和酷刑的下一阶段在这里进行。这个审讯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强迫我虚假招供，说我与流亡的西藏分离主义组织勾结制造了骚乱，这并非事实。他们会采用同样的手段，第一批审讯人员会显得非常客气，当他们没有得到想要

的东西的时候，下一批审讯员就会殴打和折磨。他们逼迫躺在地上双手绑在背后，然后他们会用电棍和警棍打我的背部，三名军官纷纷轮番殴打我。军官殴打累了的时候，会把他的脚放在我的头上休息一下，然后打电话给下一个批去接管。接下来的官员会适时地到达并进行殴打，直到他疲惫的时候，他会用我的头作为脚踏板抽烟，然后召唤下一个，这样不停的轮流。我很震惊地看到，我和西藏的许多被拘留者受到的待遇，就好像我根本就不是人！我不认为这样做是因为官员是邪恶的，但这是一个系统的做法，恐吓，再恐吓，打破精神防线！为什么所有这些继任的军官都会以自动的方式来对待我，比对待动物更糟糕？

我也坐在一张没有扶手的硬木椅子上，两个手腕各戴手铐，把手铐的一端链在窗户栏上，另一端铐在门的把手上，我的双手如此伸展、手臂、肩膀和胸部的疼痛无法忍受。后来对我实施了另外一种非常残酷的折磨方法就是“背剑”，他们先把右手拉到肩膀上，然后把我的左手从后背拉起来之后手腕戴上手铐。为了增加痛苦，他们会把大瓶苏打水或卷纸塞入背部和手铐之间的空间。然后他们会踢我的小腿和胫骨上，在这个折磨方法的整个过程中我不得不站立起来，这会给我的身体带来痛苦，被迫我这样呆了几个小时。我所遭受的另一种折磨方法是用拇指把我挂在链子上，链子固定在头顶上的铁杆上，我的大拇指承载着我整个身体的重量，我被这样悬挂了几个小时。

我很快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审讯，他们想迫使我进行虚假的招供。他们不断指责我代表西藏流亡集团行事，而且他们派我到西藏去制造骚乱。当我否认时他们会打的更加凶猛。当我痛苦地哭泣时他们喊道：“哭吧，尽可能地哭！没人在意！为了国家的稳定，我们可以这样杀了你！”

另外一个惩罚就是让我在寒冷的冬天里走路，在我的牢房里赤脚生活。我不得不睡在一张木制长凳上用一条薄被子盖住自己。有时他们会说闻到我有臭味，并且强迫洗冷水澡。当这种惩罚未能打破我的时候，他们让我陷入了饥饿。每天只给我一碗糯米粥，没有别的。我记得试图限制我的运动，以保存我从一碗粥中得到的一点点能量。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星期，最后他们再次要求我承认，当失败的时候，他们禁止我饮水。记得他们询问我整整一天没有给我喝什么，直到下午3点左右，他们问我是否感到口渴，当我点头时，他们拿起一个纸杯和一瓶碳酸饮料。在纸杯里，他们已经放了一些药水，把饮料倒进纸杯给我。强烈的渴望下我吞下了它，这饮料有一种奇怪的苦味，他们给了我另一杯，我也喝了。然后，他们让我站起来好几次，并深深地吸气，几分钟后我昏迷不醒。当我醒悟的时候，我发现那些军官问我关于自焚的事情。我只能看出他们的部分问题，比如我或者其他是否参与了平措的自焚。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在向官员喋喋不休，我以为我已经昏迷了，这一切都很混乱，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会感知一段时间，然后一切都会变得空白。我还不知道他们给了我什么样的药物。最后，两

名军官把我扔回了牢房。在那里，我找到一个新的同胞，一个刚刚被扣留的来自格尔登寺的僧人扎西，扎西帮我躺在木凳上。我病得很重我发高烧，头晕目眩，我担心这种饮料中含有一些即将杀死我的毒药。考虑到我即将死亡，我请扎西在我耳边念一些祈祷，这是西藏佛教一种仪式，帮助一个将垂死者的思想转化为积极。扎西在我前额上放了一块湿布背诵一些祷文，不久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怪异药汁的影响持续了六个多小时。

长期的审讯旨在迫使我接受不是以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应流亡藏人团体的要求。但我怎么能接受呢？任何殴打或酷刑也无法让我承认自己没有做的事情。我只是给印度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告诉了关于自焚抗议的事，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

在经过 45 天的审讯、殴打和酷刑之后，我的身体上全都有瘀伤，割伤和各种各样的伤痕。整整 45 天，没有一天不遭受殴打和折磨，然后我被转到单独监禁。我后来意识到这不仅是为了施加心理压力，而且也是为了更快地治愈伤害，消除任何酷刑迹象。大约需要 7 个月的时间来治愈伤害，之后我被转移到了马尔康的拘留中心。根据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在一个月零六天内向我提出正式控告，并且进行审判。三个月内，从控告到判决的所有程序都应该已经完成。在严重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调查，被拘留者最多可以被关押六个月。不幸的是，对于一直被嫌疑“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许多西藏人来说，当局可以不顾一切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直到判决，我的家人没有任何关于我的消息。终于被判了“泄露国家秘密罪”，被隔离监禁 1 年零 5 个月，我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3 年。宣判后我被允许与家人第一次见面，也被允许吃我的家人从铁栏另一边送的食物，这次访问持续了 20 分钟。宣判一周后，我被带到德阳监狱服刑，早前的囚犯被带到了茂县，2009 年四川地震后，监狱被转移到了德阳。

当他们禁止饮食时我的健康受到了损害，肠子缩小了，大便困难，并在大便中有血液，我每周只去一次厕所。那是他们带我去看病，监狱医生建议我应该吃饱否则可能会在一个星期内死亡。在这之后，我开始用普通的粳米粥，每天增加到三次，有一小部分的蔬菜，但还是不够。在拘留期间，我不得不接受两次肛门和直肠手术。到马尔康看守所时我的体重是 130 斤（65 公斤）。在拘留之前，我的体重是 200 斤（100 公斤）。在马尔康看守所我必须与七名中国犯人分享一个牢房，这是故意的。他们不希望我和任何西藏人分享牢房，认为我会对其他藏人造成负面影响。

2014 年 3 月 22 日，我服完刑期后被释放，但是不允许家人接我。监狱看守人员陪我到家里。通常从德阳到阿坝县的路程是 8-9 个小时，但是他们故意延长了行程时间，较长路线，还在路上进行不必要的停车，以确保避免当地的藏人迎接我，当到达家门口时已经快到午夜了。

即使释放了，我仍然受到当地警方的监控，我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我不得不每周去当地的派出所报到。监狱释放文件提到需要“特别关注”我，未经当局允许，我绝不能在我家乡以外的任何地方旅行。警方“特别关注”，因为我不仅是一名前政治犯，而且还是一名在印度生活过的西藏人。

我试图前往拉萨父母身边，但在格尔木不让我前行。他们告诉我说只有当拉萨安全部门的一名干部来这里提供担保的时候才可以继续前行。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全家都住在拉萨，但这根本没有帮助，我很想回家。

我终于决定逃离西藏，因为对我的限制很严格，不可能出生地拉萨和我的父母在一起。我经常骚扰和限制行动，当地警方会在奇数时间拨打我的手机，有时候因为网络问题没有通话，他们会立即派出二三轮车装满警察的车到阿坝的叔叔家，当时我住在叔叔家。如果我不在家里他们会威胁我叔叔的家人，包括我八十多岁的祖母，如果他们试图藏匿我，他们都会被监禁。在政治纪念日 and 重要场合如 3 月抗暴日或达赖喇嘛尊者的生日电话会变得更频繁，他们会警告我不要做任何“非法”的事情，让我想起我曾经遭受的殴打和酷刑。我逃离西藏是为了生活在自由之中“(T. Wangchu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27 December 2017)。

赛巴

27 岁的赛巴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谈关于就 2010 年的任意拘留的情况。赛巴 2010 年 7 月 27 日被捕，并在玛曲县被秘密拘留了 20 天。在被拘留时他是一名 20 岁的高中生。赛巴无法承受家乡的压迫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逃离西藏成为印度难民。

“在我被拘留之前，我是玛曲县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不是我的父母自愿让我入学，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强制上学的。许多西藏父母有这样的想法：一旦孩子去中国政府办学校，他们的孩子就会变成中国人。

2010 年 3 月 14 日，我校发生抗议活动，部分学生手拿西藏国旗，高喊口号，试图降下中国国旗。学校的藏人老师也参加了抗议活动，于是，学校的书记曲央次丹先生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校长嘉钦德昭先生被开除。一位老师兼著名的音乐家多热被捕，学校共有 17 名学生被捕。桑杰顿珠、次仁顿珠和图丹尼玛被开除。

四名穿便衣的中国警察把我带到了玛曲县看守所，没有逮捕令。西藏人在逮捕时不发出逮捕令是很常见的。有人告诉我因为参加抗议而被捕，我否认参加抗议，他们殴打我。

我被单独监禁了 20 天。当我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殴打我，并用电棍打我的全身，殴打中我记得曾多次失去意识。但是他们总是会给我泼水，所以他们可以重复同样的恐怖。我也被绑在“老虎凳”上，我的手腕和脚被绑住，如果我试图移动会变得越来越疼痛。在拘留期间，他们 5 至 6 次让我蹲“老虎凳”，总是发生在晚上。

多年来，我没有分享这个故事，因为当我从拘留中释放是 2010 年 8 月。而下个月，我必须得到我的高中毕业证书，如果有毕业证书可以申请大学继续我的学业。当时说出来会破坏我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必须小心。

一旦中国当局知道与西藏之外分享信息，他/她将立即被任意逮捕。比如，扎西热丹(Tashi Rabten)在玛曲县自焚时，我正在亲戚的咖啡厅工作(TCHRD, 2017e)。当时中国的警察在咖啡厅里听说自焚事件，他们没有付钱立即离开，后来我才知道自焚后他们已经逮捕了十二名藏人。

我记得有一个名叫次仁顿珠的人被捕，因为官员知道他同英国的一个组织分享了扎西热丹自焚的消息。他被拘留了几个月，于今年八月获释。

被拘留后，中国政府官员对我的印象不是很好，难以在那里生活，因此我决定逃离西藏。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我一个人徒步逃到了印度，如果我告诉他们不会让我离开西藏的，所以，我决定不告诉他们。我到达这里之后他们才知道。“(Soepa, personnel communication, 16 November 2017)。

洛桑达杰

3 月 16 日举行单独上街抗议游行的洛桑达杰一个星期后在阿坝县的一个中国军营中。据报告他遭受殴打和酷刑之后处于危急状态。家属担心他每天遭受殴打和酷刑以便逼供认罪。他的家人和寺院的同学担心他会因为殴打而死亡(RFA, 2017d)。

华尔旦

40 岁的华尔旦（又译雄尼巴丹）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提前被释放。他被释放得很早只服了 2 年零 9 个月徒刑的 1 年多一点，因为继续监禁将会监狱里死亡。华尔旦于 2008 年 3 月在玛曲县被指控参加抗议被判 2 年零 9 个月徒刑。他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在玛曲县被捕。他被判刑之前，已经在玛曲县看守所被隔离监禁了 2 个半月，在那里遭到审讯，遭到严厉的殴打和酷刑。截至 2017 年，他仍然患有诸如心脏病、动脉阻塞、视力低下、呼吸和听力问题等健康问题。自从他释放后，他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手术，但没有显示出健康的改善。华尔旦八岁的女儿南吉卓玛（南嘉卓玛）由于父亲过去的政治问题而被拒绝入学(TCHRD, 2017k)。

强迫失踪

强迫失踪是中国当局恐吓和压迫西藏人民常用的手段。这种滔天罪行通常用来威胁和折磨西藏被拘留者，使他们遭到秘密关押和不承认的拘捕，允许执法机关提取逼供、掩盖酷刑和法外处决。西藏被拘捕者的名录充满了令人震惊的强迫失踪事件，其中包括绑架、酷刑、拒绝合法获取医疗护理、非正常死亡和长期秘密拘押。最近的案例证实，西藏被拘留者强迫失踪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局官员。强迫失踪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很多西藏人自动假设，一旦亲人被拘捕几乎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下落。只有极少的情况下，被带入拘留中心的西藏人在没有受到身体伤害的情况下被释放（RFA，2017年）。然而，被强迫失踪的边远化、孤立、禁闭导致不可避免地出现酷刑的非法审讯手段和逼迫供认（TCHRD，2016d）。

最近被修改的《中国刑事诉讼法》使强制失踪合法化，修该法律对西藏被拘留者的处境没有什么影响。无论有无法律修改都有大量的西藏人继续在失踪，中国政府对此不负责任。中国政府通过欺骗性的法律条文在语义上将“强制失踪”的系统性暴政“最小化”，似乎是一种“住宅监视”。因为它表明被拘留者将被允许留在你自己的家里。事实上相反，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73条所述，对居民的监视可以在任何地点实施：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China Law Translate, 2013）

实际上，这项规定赋予了警方大量的权力，可以决定在没有任何独立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在“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RSDL）下消失某人。对于被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的西藏籍拘留者来说，法律并不要求警方通知其家属或向他们提供律师。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解释说，这种“非监禁强制措施”导致了“正式，合法地点以外的长期审前拘留”制度比正常的刑事拘留更为严重。它也成为威胁和遏制中国人权捍卫者的便利工具（China Change, 2017a）。

尽管强制失踪现象猖獗，以此遏制政治异议和批评者，但中国政府拒绝签署旨在消除和防止强迫失踪或非自愿失踪《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国际公约》。

2017 年 10 月，中国驻大使在第 72 届联大关于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小组对话中发表的声明，基本上为中国强迫失踪合法化辩护。

“无论是预防和消除强迫失踪，还是为受害者提供救济和补偿，都必须让国家法律充分发挥作用，并根据有关国家的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UN, 2017)。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小组宣称：“中国有强迫失踪的情况，疑似异议的人被带到秘密拘留所，经常受到酷刑和恐吓，然后被释放或进行“软拘留”，并被禁止联系外部世界”(Caster, 2017)。

1995 年 5 月 17 日，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曲吉尼玛及其父母于强迫失踪案是非常突出的案件，目前仍然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被捕时年仅 6 岁，是服刑期最长的囚犯之一 (TCHRD, 2017j)。来自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导致中国政府在 1996 年 5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承认在控制更登曲吉尼玛，据称是为了防止“普通男孩被分裂集团绑架的企图”。尽管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说明班禅喇嘛及其父母强迫失踪的情况，但中国政府并未就班禅喇嘛及其父母的下落和福祉提供任何证据。

被捕和监禁后

在以前的情况下，西藏被拘留者遭到超出限制的折磨，最终死亡。酷刑，剥夺睡眠、食物、水、干净的生活空间和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相结合导致许多人死亡 (TCHRD, 2016d)。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自 2008 年以来记录中共有 31 人在拘留期间死亡。2008 年之前的死亡人数以及未报告的死亡人数很容易累积到更多数字。据悉，监狱当局实施酷刑的唯一意图是为了制造死亡。在监狱中进行的法外处决很容易被伪装成自然死亡，如心脏病或其他原有的健康问题 (Samuels, 2016 年)。当亲人在监狱中死亡时往往不会通知家人，有时接到通知时已经去世数年之久。当亲属被告知时政府拒绝更多的信息，并禁止看到遗体。当局也已经知道，在未经许可摧毁任何酷刑证据的情况下火化尸体，有时甚至会扣留骨灰。

已经出狱的西藏人回家之后会患有一系列新的疾病，酷刑和虐待造成的身体伤害可能终身会产生影响。例如，自焚抗议者恰多嘉的妹妹因为抗议而被拘留，尽管在同一天被释放，但她仍因心脏问题而卧床不起 (TCHRD, 2017b)。有时当局将在没有服完刑期之前释放藏人，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精神疾病也是常见的，西藏人可能会经历创伤后压力症、焦虑和抑郁的经历。

前政治犯返回家乡后受到严密监视，因为他们被释放后因被判处“危害国家安全”

对其判处 1 至 5 年的“剥夺政治权利”的补充判决和其他严重罪行。政治权利被剥夺的个人失去言论、新闻、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的权利。补充条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个人实行特定限制（TCHRD，2016f）。例如，三月二十八日在狱中服刑 5 年后被释放的洛桑贡曲受到了广泛的限制，关在家中，被禁止回到他的寺院（TCHRD，2017q）。2 月 2 日受欢迎的歌手阿木去乎普君被禁止离开家乡，并禁止公开唱歌和发行歌曲一年（RFA，2017g）。被释放的藏人再次被拘留也并不罕见。例如，1 月 21 日早些时候获释的西藏僧侣和医生克珠，一个月后的 2 月 27 日再遭拘捕（TCHRD，2017h）。对于西藏人来说，当监狱的铜墙铁壁被一个看不见的监狱所取代时，释放并不等于自由。

2017 年释放的藏人

姓名	释放时期	拘捕日期	刑期与监狱	指控/罪名	目前健康状况
克珠，50 岁 *2017 年 2 月下旬再次拘捕 照片来源：TCHRD (2017h)	1 月 21 日	2016 年 12 月 14 日	不清	怀疑有关与外界分享扎西热丹自焚有关的信息；写了捍卫宗教自由的文章，并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达赖喇嘛的教诲	在拘留期间殴打受到虐待（RFA，2017n）
云丹，僧人，约 37 岁	1 月 31 日	2013 年 7 月 20 日左右	2013；3 年零 6 个月	目击唐克索仓寺僧人贡曲索南自焚抗议	相信健康（RFA，2017 cc）
阿木去乎普君	2 月 2 日	2012 年 8 月 3 日	在绵阳监狱 4 年零 5 个月	歌颂流亡的西藏领导人和达赖喇嘛	未知（TCHRD，2017r）

洛桑贡曲， 23 岁， 僧人 (TCHRD, 2017q)	3 月 28 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在德阳监狱 5 年	2011 年 9 月 26 日自焚	失去一条腿烧伤；遭受酷刑和骚扰
次臣嘉措，僧人，52 岁， 来源：TCHRD, 2017m	三月的最后一周	2008	2008 年 10 月 28 日， 绵阳监狱 9 年	2008 年领导抗议活动	未知；据信已经返回了阿木去乎参尼寺
臣列次仁，僧人 来源：VOAT (2017b)	3 月 31 日	2008 年 3 月 28 日	在绵阳监狱 9 年	从事 2008 年的抗议活动	未知
次旺益西	4 月 4 日	2008 年 3 月 23 日	9 年	据称参与了爆炸	未知
次多吉， 32 岁 来源：TCHRD, 2017p	4 月 5 日	大约在 2012 年 12 月 3 日	2013 年 4 月 5 日， 在绵阳监狱 4 年	保护自焚抗议者洛桑根登的遗体	在审前拘留中受过重伤，在监狱医院度过了第一年的刑期
次臣嘉措，僧人，44 岁 来源：RFA, 2017t	4 月 15 日	2008	10 年在德阳监狱服刑 9 年	2008 年领导抗议活动	未知
洛桑嘉措，僧人，约 23 岁 来源：TCHRD, 2017n	4 月 19 日	2014 年 4 月 15 日， 地点不详	2014 年 10 月，为期 3 年	2014 年 4 月 2 日举行单独抗议	健康欠佳
江白， 45 岁 来源：RFA, 2017x	4 月 30 日	2008 年 3 月 14 日在 玛曲县看守所	13 年在白银监狱服刑 9 年	从事 2008 年的抗议活动	较差的；遭受殴打和折磨，虚弱
果麦确培，僧人，48 岁 来源：RFA, 2017s	七月的第二周	2015 年 7 月 10 日	2016 年 2 月在 Ho Min Xian prison 监狱 服刑 2 年	收藏有达赖喇嘛照片	未知

格桑亚培 41 岁 来源: TCHRD (2017e)	7 月 10 日	2013 年 7 月 14 日在 成都看守所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在绵阳监狱服刑 4 年	呼吁西藏人 团结和自豪 歌曲歌手	未知
洛桑格桑, 僧人, 20 岁 左右 来源: RFA, 2017z	7 月 29 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德阳监狱 7 年	2011 年 9 月 26 日自焚	未知
阿朵洛白, 僧人 来源: TCHRD, 2017g	8 月 21 日	2007 年 8 月 21 日	2007 年 11 月 20 日 在绵阳监狱服刑 10 年	抗议他的叔叔荣扎阿嘉 被拘留	未知
索南嘉波, 56 岁 来源: TCHRD (2017v)	8 月 27 日	2005 年 8 月 28 日 在 Seitru 拘留中心	2006 年中 在曲水监狱服刑 12 年	藏有达赖喇嘛宗教材料和书籍	未知
贡曲顿珠, 5 岁 来源: TCHRD, 2017l	10 月 2 日	2008	2008 年 6 月 15 日 12 年, 服刑 9 年零 6 个月	从事 2008 年的抗议活动	未知
洛桑晋巴, 僧人, 35 岁 来源: TCHRD, 2017o	10 月 30 日	2012 年 9 月 1 日	2013 年 2 月, 5 年	被指责写歌 “政治”歌曲	贫穷, 已有肝脏和肾脏并发症; 以前医疗假释

图 XX：2017 年确定的政治犯大多数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姓名	被捕日期	拘留时间等	Accusations/ Activity	健康状况	其他说明
索南扎西 (TCHRD 2017s)	1 月 5 日	未知	单独上街抗议	未知	警方没有通知扎西的父母他的关押地点
未认出的西藏妇女 (TCHRD, 2017i)	2 月 25 日左右	未知	拍摄洛桑次臣单独抗议录像	未知	没有关于关押地点说明
克珠 (TCHRD, 2017h)	2 月 27 日	未知	被指责在社交媒体上张贴达赖喇嘛的教义，并在博客上发表宗教压迫的言论	未知	领取 2016 年被捕时没收的物品时再次被捕；家仍然不知其下落
洛桑达杰 (RFA, 2017d)	3 月 16 日	未知	单独上街抗议	他的健康情况危急；遭受酷刑，殴打和虐待	目前在一个军营
多贝 (RFA, 2017ff)	3 月 18 日	未知	单独上街抗议	未知	目前下落不明

贡宝 (RFA, 2017r)	5 月 4 日	未知	怀疑向外界 联络人分享 自焚的消息	未知	自从他被带 走以来,他的 状况或拘留 地点一直没 有任何说法
赛巴措 (RFA, 2017l)	5 月初	未知	自焚者恰多 嘉的父亲	未知	下落不明
卓玛措 (RFA, 2017l)	5 月初	未知	自焚者恰多 嘉的母亲	未知	下落不明
降白曲嘉 (RFA, 2017k)	七月某个时 候	被拘留 2 天后 被释放	怀疑以外界 保持联系	未知	在拘留期间 被殴打
珠古洛桑 僧人 (RFA, 2017p)	7 月 21 日	未知	未知	未知	没有信息下 落或指控
扎西丹多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 右	未知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 的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 藏人涉及自 焚视频被捕
格桑嘉措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 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 的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 有 7 名西藏人涉 及自焚视频被捕

次仁曲培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的 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藏人涉及自焚视频被捕
丹增南嘉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的 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藏人涉及自焚视频被捕
曲培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的 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藏人涉及自焚视频被捕
次仁诺布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的 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藏人涉及自焚视频被捕
次嘉 (RFA, 2017a)	10 月 23 日左右		制作和发行 几年前发生的 自焚视频	未知	地点不详； 至少有 7 名西藏人涉及自焚视频被捕
嘉巴 (TCHRD, 2017c)	12 月 23 日左右		解决自焚已故儿子贡贝者的医疗账户	未知	

结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对中国进行最近一次访问是在 2004 年。对西藏自治区拉萨的几个地区的拘留设施进行了访问。工作小组访问了至少 70 名被拘留者并分析了他们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于司法剥夺自由的规则和做法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E / CN. 4 / 2005/6/Add. 4）。尽管联合国人权机制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侵权行为，无数来源证实政府的暴行，但中国继续为这种非法剥夺自由辩解。向正义迈出的第一步是中国政府承认他们的行为，只要党国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不会承担责任，追究责任。

西藏的政治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人道的拘留行为和不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受害者，由于重新拘留和严格监视，前途是极其有限的，许多人决定离开西藏逃亡，因为前政治犯的生活充满难以承受的负担。西藏人选择离家，亲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一切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政府在藏人选择逃过程中起的作用。为了所谓的国家

安全，通过任意拘留，酷刑和强迫失踪而无理剥夺自由，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和痛苦。当公民因其政治信仰受到攻击，人权受到侵犯时他们就没有安全感或自由，把国家当作压迫者是正确的。

宗教自由

宗教是西藏民族认同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人绝大多数是西藏佛教的信徒，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中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的核心动力，并且禁止西藏精神领袖的法教和照片，收藏者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来看，宗教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西藏佛教的实践被视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和主权安全威胁，西藏人因其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遭到针对性迫害。西藏的宗教、文化长久以来政府推行的政策和行为所破坏和压制。自 2011 年底以来，对西藏佛教学习、实践人员实行更多的控制和限制，在西藏进一步造成了严重和广泛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

2017 年，中国当局继续通过折磨和囚禁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藏人，将他们的宗教奉献和崇拜行为定为犯罪。尽管西藏人在极端限制的情况下继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现出对达赖喇嘛的忠诚和虔诚，但旨在妖魔化达赖喇嘛的意识形态运动却愈演愈烈。中国政府在色达佛学院摧毁宗教修习者的住所等方式完成了强拆、人员定额。同样，为了满足中国政府规定的驱逐限额，色达佛学院人口被削减，导致成千上万佛教徒学员的长期不确定的流离失所。亚青佛学院也出现了类似的摧毁、驱逐和学员流离失所现象，再次暴露了中国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和排斥西藏佛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知名度及其对西藏宗教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无神论的政党越来越多地运用严厉的法律和政策要求所有的宗教“中国化”，积极谋求进一步控制和破坏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认同。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剧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破坏局面，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严格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引来更严格的控制

9 月 7 日，中国有关部门发布了对 2005 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修订版，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计划将从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与 2005 年的《条例》相比修订后的《条例》引入了新的限制，使政府可以任意处理所谓的“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参考：<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5390.shtml>）西藏佛教信徒和团体将面临巨大的限制和审查，如何在网上沟通和开展活动，与外国佛教团体保持联系并管理他们的财务状况。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提及“宗教极端主义”和经常使用的“民族分裂主义”，这是中国政府对默默忠于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承认的其他西藏精神领袖者的常见指责和迫害方式(Dubois, 2016)。修改后的《条例》第四条包括对西藏持不同政见者和维权人士滥用刑事指控包括的“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以及其他——等违法活动。”等中国法律法规中典型的含糊不清的全部用语。

2005 年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

第四条：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2018 年即将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

第四条：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与社会稳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不得宣扬、支持、资助宗教极端主义，不得利用宗教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进行恐怖活动。（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根据修订《条例》第 34 条，中国宗教事务监督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 11 月份发布了 10 点措施指令，禁止任何个人或集团从佛教和道教宗教场所商业化和获利以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该指令是国家宗教局、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住建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旅游局、证监会、国家文物局等 12 部门联合下发。规范佛教和道教文化场所，禁止在宗教场所以外的大型宗教造像，并禁止个人或团体投资建设（参考：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11/23/content_34900081.htm）。该指令又一次试图加强控制对中国最有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两种宗教，并确保国家对宗教场所旅游地发展进行控制的目的。在执行修订后的《条例》之前，所有地方政府都要执行这一指令，要求加强宗教团体在网上分享信息的管理和财务监督。多

年来，中国当局通过营销西藏佛教文化和景观对西藏作为异国情调的旅游目的地进行了开发和广泛的控制，导致精神修习实践的空间缩小，就像最近在色达佛学院西藏佛教社区的强拆和后续发展中见证的那样。

修改后的《条例》第三十六条涉及西藏佛教的转世制度，要求“藏传佛教活佛传承继位，一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本条遵循 2007 年的规定，赋予了党国广泛的权力，控制、操纵和干涉西藏转世转世制度，进一步推进其系统地破坏西藏宗教和文化认同的政治议程。2007 年 12 月，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活佛转世的“决定性的权利”赋予了中国政府。（参考：<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79623.shtml>）。朱维群补充说，转世问题是一个“宗教和政治”的问题，因为“佛教影响西藏的社会和政治”，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权”。他进一步确定了这一规定背后的动机之一，就是“预防达赖喇嘛利用‘活佛’转世来进行威胁藏传佛教与民族团结的活动。”然而，2007 年的规定动机和后果不仅仅把达赖喇嘛在转世过程中的角色政治化，而且将控制西藏所有的转世灵童。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政府批准了 60 多个“活佛”，规定了广泛的自由决定权，控制新“活佛”的培训教育。今年 7 月，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首批 7 名青少年“活佛”已经顺利通过了三年小学教育，其中包括 80% 的国家课程和 20% 的佛教理论（参考：<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55926.shtml>）。要求在拉萨设立的同一所西藏佛教学院，在国家监督下继续中学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化”整体目标中“培养”西藏“活佛”，使藏传佛教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考：<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71300.shtml>）。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转世制度的控制，2016 年公布了中国政府批准的所有“活佛”数据库。迄今为止，该数据库中有 100 个“活佛”名单。2017 年 4 月，微信发布通知，要求所有转世佛灵童都要持有政府颁发的“活佛证书”等证件，将从数据库删除他们的名单。据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朱维群介绍，此举旨在“防止“假活佛”威胁国家安全，因为他们“甚至有一部分钱是用来支持分裂主义活动的。”（参考：<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43275.shtml>）。这是因为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越来越多，需要控制在中国佛教徒中受到极大欢迎和大量追随者的西藏佛教上师们的影响力。

佛教中国化

2017 年，宗教中国化进行了大力推广，预计将在中国所有宗教的未来发挥重大作用。在 9 月 6 日在北京举行的以“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为主题的政府组织的论坛上，来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据称达成了“宗教的方向是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共识（环球时报，2017c）。一年来，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不止一次提出“藏传佛教就诞生在我们古老的中国”，而且，“但是藏传佛教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根据当地的实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义和仪轨，因此它本身就是中国化的典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这与 2014 年习近平承认佛教来自印度的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ICT，2017h）。西藏佛教是中国性质的说法，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因此他的公民没有“外国”的宗教信仰习俗。然而，“中国化”是一种最方便的委婉之词，它将使加强党国更全面地约束和干涉中国宗教团体的权利。中国当局以“中国化”为旗帜，要求各种宗教“融入中国文化”、“主权中国化”，力求把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政治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沈桂萍解释说：中国化是指把宗教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宗教，文化习俗，道德和文化的中国。

西藏佛教的管理与安全威胁化

2017 年 9 月在西藏拉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统战部副部长吴庆军谈到，自 2012 年以来，作为加强藏传佛教管理和安全化工作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取得了成功（“西藏日报”，2017 年）。

（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tibet/page/41/2017-10/04/04/2017100404_pdf.pdf）。吴庆军表示，新的寺院管理措施，如常驻干部和官员，建党组织、建领导班子、建干部队伍、建工作职能、寺院管理委员会（MMC）等建长效机制。只允许政府官员和党干部直接控制，排除僧尼的意见。此外，还实施了“寺庙“九有”工程”，要求僧尼悬挂四名中共领导人的肖像和中国国旗，有中国政府报刊和电视节目，政府的服务如供水和供电也在这项运动中得到推广。中国当局利用奖惩手段，每年对寺院和寺院僧人进行“考核”，确保“和谐寺庙模范”和“爱国守法僧尼”的公开认定。吴庆军还说，寺院管理措施还要求高级宗教教师和领导官员组织“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教育”课程，目的是“使藏传佛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和谐”。吴庆军的发言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号，表明过去五年来实施的一揽子寺院管理措施将成为今后几年西藏自治区永久性的一

个特征。这将进一步推动西藏宗教文化事业的安全威胁化，加大宗教自由违法行为的不可避免后果。

寺院的管理措施不限于西藏自治区而是扩大到西藏其他地区，3月6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热贡（同仁）县当局向西藏僧侣及其寺院捐赠了1万元左右的金钱和“团结友好”奖状证书（RFA，2017b）。同时宣布最近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僧侣将被查明并受到惩罚。3月10日前几天举行的颁奖仪式是为了防止在敏感（3月10日西藏抗暴）周年纪念日发生抗议活动。（图片：<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awards-03062017150927.html>）3月初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举行了类似的颁奖仪式，对西藏僧侣和穆斯林领袖给予金钱奖励，并公开赞扬他们“努力促进社区的友谊和谐，并谴责那些不合作的人”（参考：<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rewards-03282017150539.html>）

反达赖集团和宗教节日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对通信进行严格监控，但每年7月6日左右都会进一步加强限制，这天是达赖喇嘛的生日。中国还反对西藏节日，这不仅是一个社会事件，也是西藏人民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的机会。由于西藏文化强烈融入佛教，节日常常促进宗教信仰和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西藏人被允许继续庆祝，但是多年来，政府通常会派出大量安全部队在现场以各种方式进行干预。在其他情况下，官员将提前通知禁止节日。尽管有政府禁止庆祝活动的禁令和警告，西藏人经常设法采取替代方式和其他方式来抵制官方。在接受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工作人员采访青海省果洛觉囊传承寺院的前僧人仓央嘉措：“即使在这种压制政策和限制下西藏人也变得更有弹性，无论他们面对多少控制都想要践行自己的宗教，遵循自己的文化”（T. Gyats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7 November 2017）。

今年1月初，中国官员没收了希望于2017年1月11日至13日参加达赖喇嘛在印度菩提迦耶举行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的藏人的护照。前往印度和尼泊尔的西藏朝圣者也被强制要求返回西藏阻止他们参加法会，抵达机场时他们的护照也被没收。虽然官员说护照将在三月份之前归还，但有消息来源表示，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在9月仍然没有收到护照（RFA，2017w）。

2月11日，西藏人聚集在青海省海东市贡奔（塔尔）寺，参加观赏金刚法舞、酥油花祈祷会，贡奔寺有传统制作了大量丰富多彩的酥油雕塑作品供观众展示，大批武装警察抵达煽动恐吓。一位消息来源说，他们的存在使得“西藏朝圣者

非常不舒服，在普通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焦虑和恐惧”。西藏人后来被阻止看酥油雕像等待排队，而中国游客支付 100 人民币后被允许观赏(RFA, 2017c)。

7 月份，藏人庆祝达赖喇嘛生日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节日气氛。节日包括煨桑、赛马和享受舞蹈表演等。甘孜藏族自治州达吾（道孚）禁止在藏人参加庆祝活动。由于中国安全部队的到来，一些西藏人在不同地点庆祝节日的尝试也遭失败(VOA, 2017a)。

在西藏其他一些地区，西藏人公然反抗中国政府，并于 7 月 6 日举行庆祝活动。在热贡（同仁）县，西藏人关闭了他们的商店，煨桑等方式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同时也与家人和朋友进行公众野餐。在果洛藏族自治州，西藏人也在微信上张贴了达赖喇嘛的图片和生日问候以及歌颂西藏精神领袖生日的歌曲，但是由于禁止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用，用户无法分享这些内容。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安朵亚果寺的僧人们从隐居闭关修行地回来为达赖喇嘛的健康和长寿祈祷(RFA, 2017p)。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因当局质疑被拘留还不得而知。

摧毁佛学院

4 月初，中国当局实现了其宣布的目标，即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色达佛学院（Longung Gar）强拆 4725 名僧尼的僧舍，驱逐了 4828 名僧尼和佛学院学员（TCHRD, 2017u）。这个受欢迎，且吸引着全世界佛教徒的佛学院现在只允许 1500 名僧人在佛学院学习，3500 名尼师在尼姑寺院居住。在强拆和驱逐前色达五明佛学院总人口，永久性和访问学者、学生的人数估计为 2 万人。由于世界各地的西藏佛教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长和普及，而色达佛学院在广大中国人中的知名度不断升高，因此，中国政府在这些有影响力的宗教机构中努力减少人数是他们制定的一个更广泛的政治战略的一部分，这些政策的战略是破坏日益增长的西藏佛教作为西藏民族和文化认同的源泉(ICT, 2017f)。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收到的新信息证实，2015 年中国当局在色达佛学院召开了多次会议，确定了拆迁计划的三个主要原因：色达佛学院的人口过多，面积大，缺乏适当的监督管理。一些居民反驳了这些原因，并通过匿名社交媒体的帖子证明他们是政治控制的借口（TCHRD, 2016b）。对于色达佛学院缺乏监督和管理，学院的一名前学生反应并分享说：“这种担忧与政治和控制有关。例如，他们会告诉我们“你在网上分享了这个或那个，这是非法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机密”，有时候他们会说我们保存了非法的经文和达赖喇嘛尊者和失踪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照片“(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Interview, 15 December

2017)。

政府官员抱怨说西藏佛教传播和大量僧尼的，阻碍了政府发展西藏经济的计划。在会议期间政府官员会与居民讨论一些与僧侣关注无关的话题，例如制作结婚证 (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Interview, 15 December 2017)。中国政府继续表示，强拆后的发展是为了居民的福祉，实际上是修建公路、改善污水处理设施和酒店，政治目标隐藏在经济发展言辞的背后，旨在迎合游客和长期的计划，把色达佛学院变成一个迪斯尼乐园风格的旅游景点。

中国政府在色达佛学院限制和监督得到了加强，警告该佛学院的宗教领袖如果没有控制学员就会受到严重后果。已经发出口头威胁，如果发生抗议活动地方当局可以很容易地从色达县派出数百名武装安全部队来镇压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在达吾（道孚）县和达孜多（康定）等部署了武装力量。强拆开始后，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僧尼说已经不适合寺院学习和沉思实践环境。为了适应政府部门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学习的课程也已经改变。此前每月的课程包括超过 40 个不同类别的佛经和密宗课程，之后取而代之的是 18 天的佛教课程和 12 天的政治教育课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分裂国家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实现中国梦等方面的内容 (Anonymous source, personal Interview, 15 December 2017)。

数千名僧尼和修行者被强制驱逐，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强拆给宗教界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在 2016 年强拆高峰时期，发生了尼师们自杀事件，确认了三起致命事件，一起企图被阻止 (TCHRD, 2016c)。其中一名尼师次仁卓玛留下了一封遗书，由于极端限制通讯信息而如今才获得她的遗嘱 (TCHRD, 2017d)。

图 XX 次仁卓玛在 2016 年 7 月 19 日留下的遗书（英文版）。

<http://tchrd.org/demolition-at-larung-gar-tibetan-nuns-protest-suicide-note-denounces-chinas-policy-of-religious-repression/>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秘密报告中，消息来源描述，更多的尼师被驱逐，大多数僧人可以重新加入其他寺院，而尼师是不可能 (TCHRD, 2017u)。色达佛学院的宗教领袖们自行安排临时设施，在青海、四川等地建造五座大型的尼师院等小型设施，以安置流离失所的尼师。来自西藏自治区的许多被驱逐的尼师不太可能找到替代方案继续学习。4 月份，约有 300 名被驱逐的僧人被勒令离开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达吾（道孚）县贝洛的临时庇护中心，中心向僧侣提供了临时住所，但是地方当局发出了一个命令如果他们不离开，威胁说将会面临严重后果的 (RFA, 2017j)。由于缺乏政府为流离失所的僧尼提供适当和可持续的替代方案，证明了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让僧尼永久性的流离失所，最终迫使僧尼停止宗教学习和研究而选择世俗的生活方式。

图 XX 是色达佛学院的一幅图片，这些学院被毁坏，变成长长的垂直和水平的裸露的土地，平均长度为 100 米，建造楼梯和道路，使游客更容易到达酒店 在山顶上。许多居民相信，这些地带不必要的宽广而拆除更多的僧舍。

<http://tchrd.org/undercover-in-larung-gar-a-year-after-demolition-works-largest-tibetan-buddhist-institute-sliced-like-a-melon/>

8 月份开始，另一项强拆和驱逐活动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亚青佛学院展开，中国政府指定在今年年底前强拆 2000 座亚青佛学院的僧舍，并有相同数量的佛学院学员进行驱逐（RFA，2017e）。该佛学院有 1 万左右的学员常住，有数千名僧尼也无家可归，因为许多僧尼已经没有活着的家庭成员（ICT，2017f）。与色达佛学院相似，在强拆僧尼住所之后，出现了比所需要的更宽的长条空旷地带。游客和外国人被禁止参观佛学院有和访问西藏人（RFA，2017h；TCHRD，2017u）。4 月 1 日，当局已经通知到亚青佛学院西藏朝圣者和参加法会者的设立临时帐篷要求在 4 月 10 日前拆除。然而，当局在发布声明后又开始撤下 200 多个帐篷，并强迫他们离开（RFA，2017m）。

8 月 20 日，甘孜州政府宣布任命六名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对色达佛学院的日常运作进行管理和直接控制。其中 3 人负责管理拉色达五明佛学院，另外 3 人管理色达喇荣寺管理委员会（TCHRD，2017t）。建立对党色达佛学院的直接控制是中国政府寺院管理措施的一部分，目的是在西藏各地建立政治稳定的“和谐模范寺庙”和“守法僧尼”。

色达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的遭遇代表了西藏其他佛教机构所发生的事情。大众旅游使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实质和真实性减少。西藏佛教的镇压和定罪在整个西藏是广泛的，并与中国政府继续试图将西藏宗教转化为商业化产品并行。色达佛学院和亚青佛学院的强拆是为了游客利益而展开的，这与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名进行所谓的城市化建设的破坏行为如同一辙。

结论

对西藏佛教的限制和管制越来越多，导致西藏宗教自由的不断恶化。旨在控制和破坏西藏佛教的大量具体政策和做法自 2012 年起实施，使中国政府以法律的名义违反宗教自由，并将一系列宗教行为和行标为“非法”。2018 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政府践踏西藏宗教自由的局面。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将西藏佛教及其信徒视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威胁，将宗教信仰等同于可能受到监禁，酷刑和其他恐吓手段惩罚的犯罪行为。无论中国政府如何为保护西藏佛教文化进行宣传，实际上西藏佛教仍然被无神论的党国怀疑和敌意，并实

施没有无人道和违法地进行打压政策。在西藏各地进行的强制性政治教育活动中中国政府批评宗教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封建遗迹的影响，谴责达赖喇嘛是分裂主义者，尽管西藏精神领袖一直在寻求互利解决西藏问题办法。

中国政府必须毫不拖延地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允许西藏人民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和《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规定的宗教或信仰自由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西藏佛教的许多政策和做法违反了宗教或信仰自由和其他人权的国际标准。西藏宗教中心的强拆违反了 1981 年“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 6 条，人权理事会第 6/37 号决议第 9（e）和 9（g）条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旨在确保礼拜场所和宗教活动权利的委员会（OHCHR，nd）根据“2007 年“转世法规”干涉西藏转世制度的做法。并在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中进一步强调了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g）（A / RES / 36/55）“宣言”规定了“按照任何宗教或信仰的要求和标准要求，按照继任培训、任命、选举或指定适当领导人的权利”。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中的审查条款违反了“宣言”第 6（d）条，人权理事会第 2005/40 号决议第 4（d）段，人权理事会第 6/37 号决议第 9（g）（E / CN.4 / RES / 2005/40; A / RES / 36/55）。CCPR / C / 21 / Rev.1 号/ Add.4 号; A / HRC / 6/37）。特别是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名义，用不明确和过分的法律来制止宗教信仰和做法的定罪。敦促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持续的协调一致的压力，为中国在 2018 年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供具体时间表，使其宗教法律法规与国际接轨，并扭转禁止西藏人充分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的政策和做法。

发展与建设

今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他的两阶段发展计划，其目标是到 2050 年将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该计划的第一阶段包括实现“经济和技术进步”，减少城乡差距，公平获得公共服务，保护“人民参与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到 2035 年确保“和谐有序”的社会。在第二阶段，中国将增加“物质，政治，文化，伦理，社会和生态进步的各个方面”。到 2050 年将实现每个人都共同繁荣，中国将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Original reference: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10/18/c_1366888933.htm)。习近平还重申了国家对分离主义作斗争中的作用 (Ruff, 2017)。

今年 3 月，在全国人大期间与西藏自治区代表进行的小组讨论中，中国经济政策背后的领军人物李克强总理重申了维护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并承诺将加大资金投入努力开发旅游、交通和电网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民族药物，同时保护环境。为了改善教育、医疗和供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李克强承诺将加大“扶贫工作，尤其是居住在国境附近的人们的扶贫力度。(Original reference: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twosession/2017-03/08/content_28470835.htm)。

9 月份，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西藏自治区“连续 24 年 GDP 双位数增长”，2017 年上半年增长率达到 10.8%。中国当局声称，在过去五年中通过建设公路、机场和水电设施，并通过关注“改善民生，探索资源，建设工业和鼓励城市化”，实现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增长率，并将西藏自治区发展为大众旅游目的地。旅游业收入占西藏自治区 GDP 的近 29%。(Original reference: <http://en.people.cn/n3/2017/0913/c90000-9268296.html>)。

总的来说，强调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中国在西藏长期政策的基础。中国当局一直希望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有助于加速西藏人融入中华民族国家，并消除对中国当局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抵制。几十年来，中国当局一方面实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实施掠夺式发展模式，还有实施政治压制。中国多年来发起的众多发展项目包括长期运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旨在使赢得中国统治西藏人的政治战略之一部分。但 2008 年的西藏起义以及持续的镇压表明这些发展政策的失败，因为它们主要服务于中国国家的利益和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不管中国政府的报告如何颂扬西藏自治区两位数 GDP 增长，自上而下的经济发展模

式，其持续注重采掘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建设水坝、铁路、公路，管道和电力、城市化。另外大规模旅游给藏人带来了深层次的剥夺影响，并导致西藏经济的人为增长，这得益于大量的国家补贴和中国移民在双位数增长最明显的城市中心的统治地位。

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 - 2020 年）在西藏同样是不健全的发展政策，重点是农村发展扶贫和生态保护。如：“川藏铁路建设”、“新建总容量 6 万千瓦的水电站”、“西藏等地大型水库”、“中部城市化 1 亿人”，“西部地区”、“青藏高原等生态重要地区的生态恢复”（Reference: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6-03/05/content_23748481.htm）。但是这些国家赞助和国家指导的大型项目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为名使越来越多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驱逐的普通西藏人几乎没有什么益处。这些政策没有实现改善西藏农村贫困人口状况，而是使数百万农村藏人包括农民和牧民的贫困和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并极度依赖政府援助。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移民控制着西藏的经济，而西藏人仍然被困在不可持续的经济中。例如，西藏自治区的政府补贴和其他外部投资进入农业和畜牧业以外的产业，而农业和畜牧业是西藏人最常见和最有生产力的就业形式。这种经济利益造成了“非常低效率和极度依赖”的经济，以及源自控制补贴的主导文化和政治集团的特征（如汉语流利程度，汉语文化工作）以及强大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偏见与中国政府或商业网络的连接”（Fischer, 2014）。尽管该地区机遇和整体发展增加，但西藏语言、文化和习惯在现实中已经受到破坏，西藏人在不公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竞争。

习近平在讨论中国的反贫困斗争时表示在脱贫路上：“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人不能落下。”（新华社，2015）。2017 年的回顾显示，没有重大的政策变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西藏人而言以上产业的就业机会稳定，文化上适宜，对环境无害。然而，外国人在西藏自治区就业机会方面做出了改变。从 4 月 1 日起，统一的工作许可申请将简化程序，减少外国人就业文件工作量，而不是经历可能需要几个月的多个政府机构（Nyima & Daqiong, 2017）。中国政府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才，而不是投资于能产生可持续经济的本地人口。中国并没有致力于消除西藏人的结构和文化障碍，而是实施发展政策，包括所谓的扶贫计划，这些计划产生了促使更多藏人的生活贫困状况加剧的相反效果。

重新强调“生态文明”

习近平将两个发展计划融入到一个看似新的方向，就是在努力解决突出的生态问题的同时，引入更多的环境保护。“美丽中国”的目标涉及建立“管理国有自然资源资产和监督自然生态系统的监管机构”、“开发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系统，同时发誓要采取强硬步骤制止和惩罚所有损害环境的活动到 2035 年” (China Daily, 2017c)。 尽管纳入环境保护是朝着更加值得赞赏的发展方式迈出的一步，但这些政策很容易遭到怀疑，因为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仍然与环保主义者的价值观和道德不一致。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概念并不新鲜，2007 年向第十七届全国人大提交报告中首次提出。2013 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了“生态文明”包括一系列改革以解决中国的重大环境问题。努力执行更好、更严格的涉及“保护自然资源权利”制度；“建立国家公园体系”和“保护耕地和水资源管理”(Chun, 2015)。

作为“十三五”期间重新发展“生态文明”，更具体地说“青藏高原生态恢复”的一部分，中国当局宣布计划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以保护水资源流域、生物多样性、恢复草原。中国已拥有数千个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湿地、地质公园和风景名胜，占全国养护总面积的 18% 以上 (Reference: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17-10-10-20/101159240.html>)。这些保护区中有一半以上位于青藏高原 (Reference: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6696-Do-China-s-nature-reserves-only-exist-on-paper->)。在主要功能区划或“红线”的制度下，指定诸如保护区之类的大片土地 (Reference:

<http://rukor.org/national-parks-in-tibet-parking-the-nationals-of-tibet/>) 导致西藏游牧民从最富有成效的牧场上搬迁，因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来源。

今年年初，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大量官方言论集中在绘制“生态红线”，为环境保护创造“生态空间”。随后，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 2 月份“《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结束了林业等个别部门制定和实施红线的权力，负责保护生态红线的是政府和党。[Liu Qin. Ecological red lines: from words to action. 23 March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9689-Ecological-red-lines-from-words-to-action>]。生态红线围绕“生态空间”绘制，通常包括自然保护区或“保护水源”。不允许在红线境内发展，并将诸如放牧等现有经济活动列入黑名单。到 2020 年，中国各地划定红线的过程已经完成。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保护区法》要求在每个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科学分类，分为核

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严格控制的核心区域是禁止所有人类活动的区域，换句话说，该区域内的所有居民都必须重新安置。由于诸如放牧家畜和药草采集等传统习俗被定为犯罪，这些可执行规则（中国通常就是这种情况）对人们来说是非常矛盾的，他们的家园一直是现在宣布为自然保护区的那些土地（Reference: ‘Wasted Lives: China’s Campaign to End Tibetan Nomadic Lifeways’, 2015, <http://tchrd.org/wasted-lives-new-report-offer-fresh-insights-on-travails-of-tibetan-nomads/>）。

随着中国开始建立国家公园的计划，将在西藏的生产性区域周围绘制更多的红线，将其宣布为保护区，并迫使西藏牧民生活在标志贫困、失业、粮食不安全中。中国正在使用排他性的红线以气候缓解、减贫和水域保护为名将最具生产力的西藏景观消灭。自 2003 年以来，诸如退牧还草等许多政策（“关闭牧业种植草”）已经实施了禁止放牧、游牧。更重要的是，这些以保护为名更广泛地以西部大开发的名义将西藏的大部分牧区生产景观停止生产政策。但是在独立研究表明牧民行使传统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的情况下实施畜群对解决退化，生产力和景观保护问题至关重要。

近来，中国的科学研究表明，草地退化的定义包括正常的放牧压力作为退化，在对退化程度的估计中差异很大，并没有提出将放牧排除在外以恢复草原荒野的途径（Reference: ‘Wasted Lives’）。与世界范围内以社区为基础的依靠当地社区来引导恢复环境过程体验相反，但中国没有花费时间和提过牧民的知识去做退化地区恢复的土地保育工作，而仅仅依靠关闭实现恢复。但是，至少在一些偏远的西藏田园景观中这种现象正在缓慢改变，因为科学家越来越认识到古代牧民智慧在数千年来以可持续方式管理牧场以及防治荒漠化方面的价值。

三江源国家公园

到 2015 年底，中国决定将位于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藏族自治州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SNNR）升级并扩建为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国家公园。预计将于 2020 年完成预计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1.45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预计 2017 年开始的道路、访问控制设备、游客中心、保存站和污水处理设施，而指定园区的居民将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并鼓励他们保护环境，将其变成环保中心力量。（China Daily Group, 2017a）

然而，今年 9 月份发布的题为“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总体规划”的国家公园计划蓝图提出要搬迁居住在这些公园内的数以万计的家庭，而不涉及赔偿等有争议的问题。

题要求提供补偿细节。(20 October 2017, China' s National Parks to Spruce Up, By Du Caicai, Qin Ziyi, Yuan Suwen and Li Rongde ,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17-10-20/101159240.html>]. 由国务院和中央共同下发的文件还包括除了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外还计划建立更多的国家公园, 以实施“对公园进行最严格保护并将其置于红线区域内”到2020年建成统一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此外,“国家公园核心区居民将逐步迁移”(China Daily Group, 2017b)。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层在今年年初发布的公告中宣布, 将搬迁新公园区域的61,588名居民(20 October 2017, China' s National Parks to Spruce Up, By Du Caicai, Qin Ziyi, Yuan Suwen and Li Rongde,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17-10-20/101159240.html>).

第三极国家公园

今年5月,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西藏自治区当局开发的一项计划, 将位于那曲地区的色林措湖泊自然保护区升级并扩展到周边地区, 建立第三极国家公园。拟建的公园占地面积为281150平方公里, 将设在那曲北部的班戈县、申扎县、尼玛县和措尼县。不过, 报告还指出, 该计划还处于初步阶段, “公园的确切面积尚未确定”(Reference: http://www.chinadaily.com.cn/travel/2017-05/09/content_29277809.htm)。储备的扩张将导致西藏游牧民从其传统的家园和土地上流离失所, 以“消除人为干扰和增加野生动物种群”。当局还建议在拟建的公园内推广探险和野生动物园旅游, 让游客在保护区繁殖季节看到超过10万只藏羚羊的迁徙,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保护黑颈鹤的自然保护区。该计划设想的保护区旅游业的启动将有助于西藏游牧民“通过满足游客的需求而不是放牧”来谋生。

4月份, 一份独立媒体报道指出, 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发展第三极国家公园的计划, 该国家公园是全球最大的国家公园, 覆盖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 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地区(Reference: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088442/china-plan-s-worlds-biggest-national-park-tibetan>)。报告援引研究人员, 他们是2017年6月科学考察西藏的一部分地区, 这是中国当局数十年来在青藏高原发起的第二次科学考察, 旨在“研究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变化”, 称这次考察是部分旨在提供“在色林措地区建设国家公园的数据和建议”(Reference: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6/17/c_136373489.htm)。预计这次考察将持续5至10年, 色林措地区是其第一站。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有长远计划, 将青藏高原的整个长度和气息都缩小, 并将其变成纯粹的保护区, 并为未来

的开采提供能源储备。

阿卿贡嘉（可可西里）世界文化遗产

今年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名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也称阿卿贡嘉）划入约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作为世界遗产现场。通过可可西里的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已经接受了一个框架，该框架将传统田园土地使用定义为一种威胁，将传统的生产性和可持续性活动（如放牧和采集药草）定为犯罪（ICT, 2017c）。中国当局多年来让西藏牧民在很少或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强迫迁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看来，很多西藏游牧民早在中国申请遗产之前就被从阿卿贡嘉及其周边地区迁出。（The Tibetan Plateau: the plight of ecological migrants, Feng Yongfeng, 02.10.2008.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2445-The-Tibetan-Plateau-the-plight-of-ecological-migrants>]

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阿卿贡嘉现在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较大的保护区的一部分。据信，阿卿贡嘉作为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的地位将鼓励大众旅游。对可持续居住在可可西里的居民的影响令人不安，其新的地位将需要保护居民的工作，并限制广泛的经济活动（Chen, 2017）。

虽然中国声称给予阿卿贡嘉的遗产地位将有助于保护濒临灭绝的藏羚羊，但遗产地的边界并不包括濒危物种的全部迁徙范围，这些濒危物种的母藏羚羊要远离掠食者全洄游范围广泛，除了青海，新疆和西藏自治区。（Gabriel Lafitte, IS A RAILWAY A GIFT TO ANTELOPE BIRTHING? 8 June 2017, rukor.org, <http://rukor.org/is-a-railway-a-gift-to-antelope-birthing/>）。但是，穿过可可西里中部的250公里宽的青藏工程走廊（QTEC）提供了豁免，允许在铁路、高速公路、超高压电网、光纤电缆和石油管道等在保护区内进行密集开发。该项目工程对藏羚羊保护没有任何的益处。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承认，教科文组织的碑文将阿卿贡嘉列为“自然世界遗产”，但“除了传统的放牧习俗外，被提名的财产还包括当地存在具有国家意义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属性圣山和遗址。每个村庄都有其神圣的地方，其中一些属于财产和缓冲区，主要是与洞穴，丘陵或山脉等自然景观相连的祈祷点。”

（Gabriel Lafitte, ERASING NOMADS AND MEMORY OF PASTORAL PRODUCTIVE LANDSCAPES, 8 June 2017, rukor.org, <http://rukor.org/erasing-nomads-and-memory-of-pastoral-productive-landscapes/>）。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藏游牧文化和信仰体系在作为土地和动物

监护人、管理者的保护和可持续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Wasted Lives, 2015)。

今年 4 月, 约有 200 多户藏人家庭生活在昌都的巴宿县和左贡县, 要求为一个未指明的政府建设项目让路, 因此被命令离开他们的家园。家属不得不登记他们的姓名, 中国当局承诺将获得 12000 至 20000 元人民币 (美元 2, 176 至 2, 901 美元) 之间的赔偿, 尽管援助后来被撤回。现在, 这些家庭生活在于左贡和八宿县的嘉莫俄曲 (金沙江) 边的两个城镇。由于移民区缺乏生计资源, 许多贫困家庭陷入窘境: 无法生活在当前的位置, 无法搬家。有些家庭提出上诉要留在他们以前的家中, 但被告知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政府令。虽然社区没有被告知搬迁的确切原因, 但围绕河流上的水电大坝建设, 该地区的一个大型道路项目以及在中国地质测量员多次检查过的圣山自 1991 年以来开采。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families-04042017163329.html>)

。

7 月份, 昌都地区接到命令腾出土地的藏人村民开始向上级政府申请许可。几个世纪以来, 这些土地一直由村民及其祖先养殖, 但现在被地方官员要求发展。当局表示, 他们需要建造医院、学校和公共场所, 并提供低额的搬迁补偿。村民们怀疑“这些官员反过来以更高的价格向中国商人及其亲属出售商业开发用地”。村民们认为, 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要求他们迁移并决心将他们的不满投诉上级部门。中国官员已经威胁要求村民在 7 月 20 日之前签署他们土地的移交协议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vaiction-07062017164203.html>)

。

8 月, 来自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牧民被迫从传统放牧场迁移。截止日期为本月 23 日, 通知宣布超出日期的任何人将由武警会晤并罚款 1000 元 (152 美元)。为了进一步确保将被完全驱逐, 警方表示, 任何入住的人也将被监禁。

来自达日县德昂乡的吾阔和塔阔村的牧民也被命令从他们的冬季营地迁移。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现在正面临官员不断骚扰。他们非常担心会发生什么事。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grazing-08302017133026.html)

发展和保护

尽管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等保护区限于开发活动, 但中国当局继续在西藏实施经济和军事等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开发项目。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旨在促进旅游业, 这是该地区 GDP 总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西藏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文化遗产是政府推动旅游业项目发展的重点, 包括野生动物观光、冰川观光、高山探险和河源探险等旅游消费开发荒野景观。随着中国高度工业化和发达城市的污染加剧, 中国富裕的游客大量涌入创造了西藏户外休闲活动的新需求。越来越多的青藏高原保护区为经常非法开采自然景观和自然资源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

由于中国在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记录不佳，人们仍然担心保护区内的旅游业将导致当地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退化而不是保护和生物多样性。[Wang et al. (2011).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in China: Conservation or Commercializ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57853/>]。过去的做法表明，国家公园通常更多地迎合游客美元的兴致，这是公园除政府资助外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不是保护公园的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此外，游客的涌入给当地居民带来的益处不大，正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发展所见。这个公园于2007年宣布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其中包括通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努力创建的“鼓励政府和其他选区采用新模式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景观”。但这些公园很快成为大众旅游的目的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地方当局负责并利用这些公园来推广大众旅游，让当地居民退出参与并降低保护活动。[Mapping Shangrila: Contested Landscapes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Edited by Emily T. Yeh and Christopher R. Coggins. Foreword by Stevan Harrell. Afterword by Ralph A. Litzinger, Publication Year: 2014,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中国政府重新强调促进生态文明，同时宣布彻底改革破碎的国家公园体系，是否有助于实现保护目标与经济发展和旅游需求之间的关键平衡，仍有待观察。9月份发布的关于发展国家公园的新蓝图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供任何指导。[<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17-10-20/101159240.html>]。它也没有涉及管理住在公园中人们的生活争议问题。[China overhauls its national parks, Liu Qin, 19.10.2017, China Dialogue,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0152-China-overhauls-its-national-parks->]。

采矿和草地退化

据报道，中国当局在今年8月至9月间派出8支中央环保督察组到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青海、新疆和西藏自治区对环境污染进行了重大打击。中国官方媒体引用环境保护部的报道称，有5763名官员因环境保护不力而被追究责任[5,763 officials held accountable in latest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Xinhua Published: 2017/9/18,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6925.shtml>]。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四次环保督察组，作为全国范围内抗击数十年爆发性污染和环境退化运动的一

部分而已启动。

在西藏自治区督察的结果为 1022 起污染事件,其中 784 起罚款总额达 2800 万元。此外,农村的 242 个基础设施项目按法律要求开始建设,但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纳木错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也发现了非法基础设施,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保护区内。青海省发现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进行非法煤矿开采,这“严重破坏”了草原并摧毁了附近的山体。[Coal pits in Qinghai nature reserve to be restored to protect ecology, Liu Caiyu, Global Times, 2017/8/31,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4203.shtml>]。2016 年,甘肃省多拉让莫(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发现 52 处非法采矿作业。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创建于 1987 年,旨在保护各种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祁连山已成为多年来非法采矿和其他开发活动的天堂。在祁连山盆地发现的 150 多座水电站中,有 42 座位于保护区内。祁连山 50 年来共有 509 条冰川消失。7 月份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一份文件列举了该地区过多的环境破坏活动,包括“过度开采矿产资源,非法建设和运营水电设施,以及当地企业过量排放,还有因为地方官员没有纠正现有的环境问题。[China tightens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in Qilian Mountains, China Daily, 2017-07-21,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7/21/content_30213753.htm]。该文件还指出,祁连山保护区的环境违法行为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过度和无序的发展使该地区陷入严重危机,水源受到污染,草地退化” [China punishes officials over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in Qilian Mountains, Xinhua| 2017-07-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7/20/c_136459844.htm]从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环境巡视调查活动结果中可以看出掠夺性发展项目在西藏高原造成了广泛的环境退化。然而,为解决祁连山局势,张掖市党的主要领导人宣布实施退牧还草政策三年,将导致牧民及其畜群的驱逐出保护区,并将采矿和过度放牧的影响等同起来。[China tightens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in Qilian Mountains, China Daily, 2017-07-21,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7/21/content_30213753.htm]。

在启动西藏自治区环境巡视的几个个月前,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席洛桑江村在 3 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藏自治区当局在过去四年中没有批准任何采矿项目,这表明在污染活动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Global Times”; March 11, 2017, “Tibet priorities ecology over development projects”, <http://en.people.cn/n3/2017/0311/c90000-9188825.html>]。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43938.shtml>) 矿业和旅游业一直是西藏的“支柱产业”,西藏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大部分矿产资源由于地理地形的困难和昂贵的开采成本而未开发。表面上西藏自治区停止新的采矿项目最多,

但只是暂时的，而且最具欺骗性。至少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会发现进口矿产储量比在国内提炼矿藏要便宜。为了解决建立第三极国家公园计划背后的目的，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自然保护区审查委员会成员王世平曾表示：“政府决定保留西藏自然资源作为战略储备”。表明只要能够廉价进口这一战略储备就不会遭受掠夺性开采。国有企业和非法实体早已利用西藏丰富的矿产储量，尽管这些采矿业务仍集中在矿藏浓度特殊的特定地区。例如，提取工业贡献了青海省 GDP 的 40% 以上，按面积计，90% 以上在藏人自治县和自治州。[Innermost Veins of our Planet #2, March 21, 2017, rukor.org, <http://rukor.org/innermost-veins-of-our-planet-2/>]

锂对西藏高原的冲击

用于制造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无人机（军用和民用）、电动汽车和其他新能源汽车（NEV）的锂电池已成为最珍贵的矿产储量之一。全球锂需求预计将从 2016 年的 189,000 吨增加到 2026 年的 100 万吨。尽管中国巨大的碳酸锂储量 320 万吨位居世界第二，约占全球总量的 20%，但仍然由于锂开采中的技术和地理挑战而导致材料依赖严重进口。中国的锂储量大部分集中在四川、青海和西藏自治区。[NEVs’ future rests on cost-effective lithium mining, Global Times, 2017/12/17,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0758.shtml>].

近年来，由于锂在全球供应有限以及中国巨大的需求和进口，碳酸锂价格一直在上涨。中国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也出现快速增长，据官方预测 2020 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将达到 200 万辆，2025 年至少 20% 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全部汽车销量的 20%。中国国内电动汽车市场的预期热潮导致急于开发青藏高原的锂矿。在青海察尔汗盐湖及柴达木盆地周边地区含有全中国锂矿床的 83%。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the-fortune-hunters-of-qinghai/article22334344.ece>]. 2014 年青海统计年鉴指出，2013 年从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柴达木盆地湖开采锂 570 万吨。格尔木是青海盐湖的入口，除了 2006 年推出的格尔木-拉萨铁路之外，格尔木现在还有一个全新的机场，该机场于 2017 年末完成以促进锂矿开采。[December 21, 2017, YU NAKAMURA, Nikkei Asian Review, The future of electric cars is at the bottom of a Chinese salt lake,

<https://asia.nikkei.com/magazine/20171221/Business/The-future-of-electric-cars-is-at-the-bottom-of-a-Chinese-salt-lake>] 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青海盐湖实业公司和卓域成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在青海成立锂电池生产基地。[Lithium trade to transform, Ma Jingjing, Global Times, 2017/8/16,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61637.shtml>]. 比亚迪还

拥有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扎布耶盐湖开采锂 20 年锂的独家权利既到 2030 年为止。[Gabriel Lafitte, ‘Spoiling Tibet: China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Zed Books, 2013].

正如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加基卡矿，从硬岩中提取相比从青海盐湖中提取锂更容易，成本更低。但随着锂离子电池革命在中国国内市场蒸蒸日上，以及锂在海外市场的成本上升，锂从硬石中提取的限制正在消失。[TIBETAN LITHIUM IN YOUR POCKET, November 6, 2015, rukor, Gabriel Lafitte, <http://rukor.org/tibetan-lithium-in-your-pocket/>]。今年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阿坝和羌族自治州可尔因矿石集中区发现了一块 51.95 万吨的锂矿床，预计“将减少中国对进口的依赖，因为能源专家呼吁保护其开采和创建一个战略储备。”[Massive lithium deposit found in Sichuan, Shan Jie, Global Times 2017/12/25,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1954.shtml>]。中国地质学家对这一发现表示欢迎，认为这是阿坝成为中国“锂谷”的突破口。尽管环保问题和当地藏人抗议，中国继续允许在西藏高原开采自然资源。在拉噶（塔贡）等富含锂的矿藏开发，2016 年遭到当地藏人持续抗议而暂时停止锂矿开采。[Temporary halt to mining after protest in eastern Tibet: the rush to invest in Tibet’s lithium,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MAY 9, 2016, <https://www.savetibet.org/temporary-halt-to-mining-after-protest-in-eastern-tibet-the-rush-to-invest-in-tibets-lithium/>]锂也含有丰富的稀土元素如铌、铍、钼等。[Innermost Veins of our Planet #1, March 21, 2017, Gabriel Lafitte, <http://rukor.org/innermost-veins-of-our-planet-1/>].

宣布暂停采矿是因为西藏丰富的水电资源日益受到关注的同时，加上建立更多的保护区，并将中国定位为气候变化的倡导者。[China’s Xi positions himself as free trade and climate champion, By James Griffiths, CNN, May 15,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5/15/asia/china-free-trade-protectionism-trump/index.html>]。中国政府在控制和开发西藏水资源方面看到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力，因为西藏是亚洲主要河流的发源地。随着西藏水资源成为许多国家的宝贵商品中国继续开发和商业化，因为西藏自然资源非常丰富。除了为“十三五”规划宣布的水电项目数量之外[China plans more dams and mega infrastructure in Tibet, Beth Walker, March 21, 2016, The Third Pole, <https://www.thethirdpole.net/2016/03/21/china-plans-more-hydro-projects-and-mega-infrastructure-in-tibet/>]。中国有一个庞大而不断增长的矿泉水行业正在攻入脆弱的水资源。例如，西藏林芝德吉实业有限公司从一座神圣的比日神山 4500 米高的山峰获取水源，虔诚的藏人每年春天都会去参加一次需要 24 小时才能完成的冥想仪式。尽管一些中国官员认为水瓶矿泉水行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但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增加，因为该行业的扩张，

对西藏环境的开发只会加速冰川消耗 (Vanderklippe, 2016)。在“分享西藏与世界的良好水源”运动下, 中国当局以减税, 低息贷款和小额提取费形式向装瓶水公司提供奖励, 每立方米(或 1000 升)仅需 3 元人民币(0.47 美元)(Reference: <http://www.todayonline.com/commentary/bottling-water-glaciers-not-way-quench-chinas-thirst>)。中国已经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瓶装水消费国之一, 每年销售额增长 6%, 而且这些数字预计只会增长。7 月份, 利物浦足球俱乐部(LFC)宣布西藏水资源有限公司将成为他们在中国的官方区域水合作伙伴(LFC, 2017), 引发了利物浦球迷 27000 签名强烈敦促关注。在回复一封电子邮件中 LFC 的一位代表曾表示, “这些担忧需要直接与西藏水资源有关” (Tibet Society, 2017)。尽管 LFC 球迷的压倒性批评, 赞助商目前仍然保持原来的做法。尽管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藏冰川的萎缩和消失, 但中国的采掘开发项目无疑加剧了这种情况。

扶贫

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的主要发展议程是扶贫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通过重新安置中国 1000 万“贫困人口”来消除极端贫困[China pledges resolute measures to root out poverty by 2020, Xinhua, 2015-11-2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5-11/29/c_134864846.htm?utm]。为了在 2020 年之前发起“贫穷战争”以创建“小康社会”, 中国当局已经安排了 9463 亿元的搬迁投资。[“Notice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Issuance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Relocation”,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610/t20161031_824916.html]。在西藏自治区、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的其他西藏地区实施扶贫项目, 主要涉及居住在农牧区的西藏人的搬迁, 搬迁针对生活在“高寒地区”、“恶劣条件”的疾病流行区、资源贫乏地区、高山峡谷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地方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生产发展缓慢的地区、生活水平低的地区, 贫困地区。[Tibet to relocate 263,000 poor people by 2020, 2017-02-02, China Tibet Online, <http://eng.tibet.cn/economy/news/14860007944.shtml>] 当局根据政府的逻辑, 西藏人贫困因为仍然居住在 AC 古老和严酷的气候和地理。如此简单评估无意中或通过设计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项主要宣传胜利: 1) 西藏贫困与几十年失败的发展政策无关; 2) 自上而下的搬迁有助于消除极端贫困。正如安德鲁菲舍尔在对西藏自治区经济学的评估中得出的有力结论, 中国的政策具有加强该地区的贫困, 不平等和不发达的作用。[Canada Tibet Committee. Poverty By Design: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In Tibet. Montreal: Quebec;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ca>. Accessed August 20, 2016]。

扶贫卡在许多政府宣传中用于多种目的：抵制对不良人权记录的批评[China's poverty eradication among the greatest human rights achievements: expert, People's Daily, March 05, 2017, <http://en.people.cn/n3/2017/0305/c90000-9186004.html>]，促进政治稳定 [Chinese government advisor says more Mandarin needed to fight poverty, August 26,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language-poverty/chinese-government-advisor-says-more-mandarin-needed-to-fight-poverty-idUSKCN1B608P>]，并证明非自愿搬迁和强有力征地的理由。

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显示，重新安置或重新安置政策导致了进一步的贫困，粮食不安全和水资源短缺，而不是消除贫困或保护环境。这些政策在生态和经济上不可持续，并加剧当地的生态和社会问题。[Solving one problem by creating a bigger one: The consequences of ecological resettlement for grassland restor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Mingming Fan, Yanbo Li, Wenjun Li, Land Use Policy, Volume 42, January 2015, Pages 124-13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64837714001586>]。在西藏一些地区搬迁甚至不能保证住房安全。6月，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和顿达镇的游牧民被安排搬出他们的家园。在被迫减少或摆脱他们的牛群并居住在定居点两年后，他们再次被迫移动而没有任何关于赔偿的细节（RFA, 2017v）。为了建设旅游中心和员工住房的政府项目，定居点被拆除(Tibetan Review, 2017b)。那些仍然有一些家畜的人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没有进入临时定居点的人却比他们在重新安置的家中面临更加贫穷。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许多人都求助于生存。随着这种政府虐待和忽视的趋势，中国当局未来和并正在对西藏牧民实施更多的搬迁计划。

在西藏人权状况恶化的背景下，中国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UND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html>]其中扶贫和公平是明确的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以议程依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尊重国际法。它以《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条约为基础并参照了《发展权利宣言》。还“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提供平等的诉诸司法的机会，并建立在尊重人权(包括发展权)，有效法治和各级善政的基础之上透明，有效和负责任的机构。”[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联合国关于极端贫困与人权的指导原则”强调，基本人权原则是所有政府减少或消除贫困政策的基础，应当设计和实施如所有权利的尊严，普遍性，不可分割性，相互关联性和相互依存性；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平等享有所有人权；生活赤贫者的机构和自治；参与和授权；透明度和获取信息；问责制。[The Guiding Principles on Extreme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OHCHR_ExtremePovertyandHumanRights_EN.pdf]。

中国将人权视为理想和从属于集体稳定。中国采用后果主义的方法，中国政府认为人权是以发展结果的实现。但这种以发展为中心的方式并没有解决西藏贫困和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而侵犯人权的情况比比皆是。2016年8月，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通在其《关于访问中国的报告》中承认，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困境“深层次问题”，然后又说：“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暴露应对严重的人权挑战，包括显著提高贫困率，种族歧视和强迫搬迁”。报告强调，少数民族的状况是中国在反贫困工作中最重大与平等相关的挑战之一，他指出，藏人和维吾尔人等8个拥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的省份的贫困率超过了12%，而全中国7.5%。

很明显，中国的自上而下“一刀切”的扶贫方式已被证明不适用于西藏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游牧社区的人。中国政府的反贫困计划更多地关注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消除西藏农村社区的极端贫困。西藏人越来越被迫放弃自己的土地，失去粮食安全并依靠政府救济，以便中国表面上可以通过创建大片保护区来维护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野生动物保护、碳捕获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导力。在设计和执行反贫计划中西藏人没有参与，他们的生计利益也没有得到保护或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

使用武力和恐吓实施扶贫计划

今年7月，在西藏安多尖扎县尖扎滩乡的西藏牧民向乡当局提出了一份18点的请愿书，批评使用“武力、恐吓和镇压”将牧民以“精准扶贫”名义将西藏牧民迁离他们的祖先土地。2017年7月3日的请愿书由230个家庭的41人签署。他们被勒令迁往萨噶尼嘎在那里政府正在安置300所房屋。请愿被忽略，地方当局继续进行搬迁计划。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得了一份用西藏文写成的请愿书副本。

根据2016年开始的搬迁计划，每个家庭都得到了一幢以20000元的成本

建造的房屋，并从政府处借贷了 1 万元。搬迁协议中提到，只有政府拥有对牧场的唯一所有权。这是协议中的条件之一，牧民，特别是那些有家畜的游牧民难以接受。尽管有人反对，乡政府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举行了一项仪式，标志着住房设施的完工，并宣布搬迁 230 户家庭。

在请愿书中，当地的西藏人表示担心，未来会被迫放弃牧民生计来源放牧的权利。他们批评乡政府所建的房屋设施质量差，与 2016 年制定的蓝图不同。例如，木门已变成金属门。由于使用便宜的建筑材料可能危及居民的安全，一些房屋在遭受强降雨后开始出现裂缝。

请愿者还表示强烈反对使用中文起草搬迁协议，并要求今后在所有文件中使用藏语。他们补充说，官员必须公开向人们解释文件的细节，然后不让他们盲目签署。他们抱怨说签署的协议没有包含任何日期或时间。

请愿书中的第九点特别要求当局停止使用“武力、恐吓和镇压”来重新安置牧民。然后，请愿书要求按照国家标准为扣押牧场者全额赔偿，并敦促地方当局“停止使用欺骗、武力和恐吓”来支付较小的赔偿金。一些牧民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土地供电塔的补偿。

批评乡当局为扶贫项目滥用资金，请愿者要求向牧民提供工作机会，然后抱怨不仅有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而且还有非熟练的劳动力来自外地，剥夺了当地游牧民在本地找工作的机会。

请愿书的结论是，只有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通过牧民们的参与和决策才能确定一个人是否摆脱了贫困。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些西藏网民在一个网上聊天小组中分享了墙壁和天花板破裂的安置房的照片，引发了小组成员之间的激烈讨论。网友就扶贫项目推动的房屋建设不足交换意见。不久，网上审查就开始行动起来县当局展开调查。调查结束时，最初分享此信息的人也被拘留，他也是聊天组的创始人。参加讨论的其他人也被拘留并讯问了一天。此后他们被加强监视。

